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第007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

2022年5月

目 录

本期导读

01

学术聚焦

02

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赵波.....	02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意义和挑战 赵耀辉.....	06
《职业教育法》修订与中国教育的必要改革 姚洋.....	15
应加强而不是削弱平台经济创新能力 黄益平.....	22
中国远程办公的动力、特征与前景 胡佳胤.....	25

月度精选

30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当代中国青年的使命与机遇 林毅夫.....	30
本轮全球通胀的疫情与非疫情成因相互交织， 结构性和货币性特征更为彰显 卢锋.....	36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看今年的经济形势 姚洋.....	41
数字化加速度——工作方式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陈春花.....	46
从战争学管理——如何突破不确定性局面，变被动为主动 宫玉振.....	54

学院资讯

60



本期 导读

北大国发院简报

第007期

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7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

本期简报内容主要还是学术聚焦与月度精选两大内容。

学术聚焦的内容主要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改革政策的最新解读。3月以来，新冠疫情加重，继深圳之后，上海、北京等多地深陷疫情。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如何？国发院专门组织了一场内部研讨会，以赵波副教授的研究文章为代表，给出了一些分析方法和影响评估。同时，在改革层面，个人养老金、职业教育法、平台经济等都出现了新动作，国发院也专门邀请教授进

行解读。本期还有一个国发院和智联招聘一起进行的专项研究成果，即中国远程办公报告：在新冠疫情的推动和数字技术的拉动之下，中国远程办公的特征与前景。

本期的月度精选有六篇文章，分别是林毅夫教授对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勉励，卢锋教授对于本轮全球通胀成因的分析，姚洋教授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陈春花教授讲解数字化对工作方式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以及宫玉振教授从四渡赤水的史实提炼出对现代领导力的启示。

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在简报最后，我们附有订阅二维码和联系方式。

主编：黄卓
执行主编：王贤青
2022年5月30日



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¹

赵波²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全面暴发以来，我国实行了“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极大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两年前低后高、强劲复苏，2020-2021 两年年均增长率达到 5.2%。

新冠疫情既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又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极大地增加了宏观经济下行的风险。严格的防控政策有效地减少了传播的风险，但封区封城的政策也不可避免的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

如何统筹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目前政策制定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21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2022 年的经济工作重心为“稳增长”，随着奥密克戎变

异株成为最主要的流行毒株，新冠病毒的传播又迎来新的一波高峰。疫情因素成为我国 2022 年经济增长面临的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以下将从消费、投资、进出口、劳动力市场几个方面观察和总结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

一、消费支出触底反弹、为经济增长提供主要支撑

受 2020 年新冠疫情第一波冲击的影响，总消费在 2020 年对 GDP 的贡献首次降为负值（-6.8%），在 2021 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又触底反弹至 65.4%。数据显示 2020 年居民消费的下降幅度高于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幅度（图 1）。

1. 本文整理自北大国发院“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课题组核心成员赵波在 2022 年 4 月 3 日的课题研究成果初步汇报。

2. 赵波：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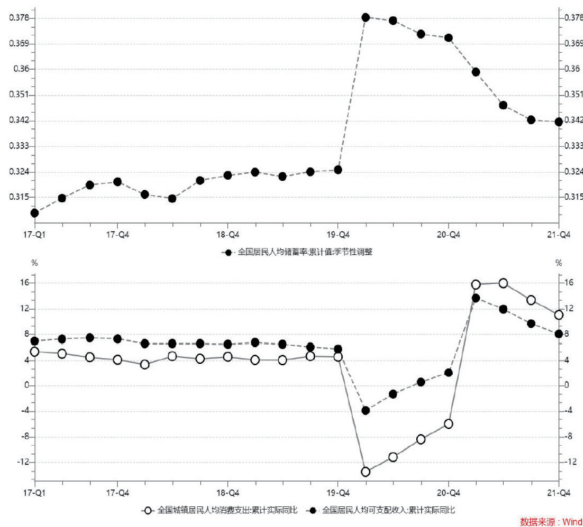


图 1：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
实际累计同比、居民储蓄率

疫情导致消费下降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疫情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2019 年四季度之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出现大幅下滑，导致家庭消费支出下降。

其次，疫情让很多人担心被病毒感染并且对经济预期悲观，这些风险的上升导致居民主动降低了消费，增加了储蓄。

最后，消费下降与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有关。疫情越严重，需要的防控力度越大，增加了消费的交易成本，减少了居民消费。

随着 2021 年疫情得到控制，我国的总消费也触底反弹。但 2021 年末居民的储蓄率仍高于疫情前 2 个百分点。这其中的可能的原因有多种，但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可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疫情卷土重来的风险仍然存在，收入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造成了居民不愿增加消费。

分消费类型来看，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服务消费和线下的实物商品消费，而线上的实物商品消费并未受到影响。比较各类型消费品的社会零售品总额累计同比增速可以发现，变化比较平缓的是实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而服务消费和线下

实物商品的零售额波动幅度明显更大（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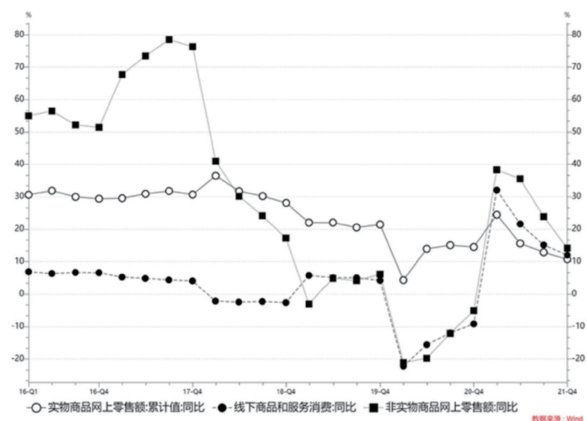


图 2：分类型社会零售品总额累计同比增速

为了进一步分析疫情对线下消费的影响，我们利用了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23 日线下若干个监测商圈的人流量数据、美团生活服务线上消费数据和京东电商数据，分析了两类不同程度的疫情传播对消费造成的不同影响。

第一类是“散发式疫情”，定义为在首例患者出现后 5 天内新增少于 10 例的疫情；

第二类是“暴发式疫情”，定义为在首例患者出现后 5 天内新增病例多于 10 例的疫情。

从影响的持续时间来看，两类疫情产生的影响都将持续两三个月。从影响的力度上看，散发式疫情因为感染者较少以及政府采取的管控措施较宽松，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力度较小。散发式疫情最高减少线下消费 8% 左右，而暴发式疫情最高可以造成线下消费下降达到 80%。

疫情对线上服务消费的影响也较大。和线下消费类似，散发式疫情对线上服务消费的影响比暴发式疫情的影响要小得多，而短期内突发大规模疫情对线上服务消费的影响则非常大。此外，无论是散发式疫情还是暴发式疫情，对线上实物商品消费的影响都不大。

结合上述因素，我们最终发现每增加一个散发病例，会使得疫情后三个月的线下人流量平均



减少 3.6%，生活服务线上消费平均减少 2.7%，当地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0.36%。而每一次“暴发式”疫情，会使得疫情后三个月的线下人流量平均减少 24.7%，生活服务线上消费平均减少 21.5%，当地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3.0%。

二、投资前低后高、第三产业投资明显放缓

我国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由 2020 年的 81.5% 陡然下降到 2021 年的 13.9%，是 1992 年以来的最低值。

造成投资贡献率的大起大落的原因有二：一是消费在 2021 年强劲复苏后对 GDP 增长的贡献较大，分散了资本对 GDP 增长的贡献；二是投资本身在 2021 年增速放缓。

分产业来看，相较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特别是一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交通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以及一些受到产业政策调控的行业，如教育和房地产业。

此外，新企业注册的数量和资本持续下降。2021 年 4 月以来，新企业注册的数量和资本持续下降并在 2021 年第四季度出现负增长。

分产业来看，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制造业和采矿业均为负增长；第三产业中的住宿和餐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民服务、房地产业、金融业、教育等全年降幅均在 10% 以上。2021 年以来投资下滑比较严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占主导的行业。

三、贸易出口增长势头强劲、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由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生

产受疫情影响较大，我国对世界主要地区的出口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采矿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增长最明显。2021 年我国进出口增长占 GDP 增长的 21%，达到 199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为 GDP 增长贡献了 1.7 个百分点，相较于消费和投资表现抢眼。

同时，我国的贸易结构在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出口持续快速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占整体的比重在 2021 年提升至 48.6%，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我国一般贸易占进出口金额的比重也加速提升，目前已经超过了 63%。

四、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长放缓

疫情的发展影响企业的营利能力，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而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限制了人员流动，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成本，增加了失业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我国城镇 25-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在疫情初期急剧攀升，于 2020 年第二季度达到峰值，之后逐步下降到疫情暴发之前的水平。

在劳动力市场上，疫情对不同人群造成的影响不同。年轻人的失业率上升更高，16 岁 -24 岁的年轻人在 2020 年 -2021 年的平均失业率仍然高于 2019 年的 1.1 个百分点。从 2021 年下半年以来，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略高于本地户籍人口 0.2 个百分点。我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疫情可能导致农村务工人员周期性失业，而登记的失业率不一定能反映农村务工人员的失业情况，因此我们可以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和收入情况分析。2020 年 -2021 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和收入的平均增速分别仍低于疫情前的 1.6 和 0.7 个百分点。

北大国发院于 2020 年与腾讯智库合作进行的“从业人员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的人口特征和经济变量之后，封城政策平均会

使得该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可能性下降 11.5-13.2 个百分点，而单独执行“封小区”政策地区的就业负向影响不显著。

封城政策对不同从业者有异质性效应。研究显示，受封城政策影响，农民工复工率比当地劳动力低 7 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复工率比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低 28 个百分点；相比蓝领员工，白领员工（如 IT、教育、金融、医疗、社会组织从业者）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受封城政策的影响较小；高学历劳动者受封城政策的负面影响较小；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员工比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员工更有可能重返工作岗位，而自雇劳动者受到的就业冲击最大。

2022 年经济增长预测

我国经济在 2022 年的增长受到本国宏观基本面、疫情传播和防控政策的影响，同时也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疫情走势，以及地缘政治走势相关。

我们在研究中构建了中国宏观 SIR-Macro 模型，通过使用奥密克戎病毒传播的关键数据（包括基本再生数、病死率、不同人群疫苗接种率、无症状感染率等），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预测

了奥密克戎病毒传播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 日，我国出现确诊病例的城市共有 206 个（不含港澳台），这些城市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70%，GDP 占全国 GDP 总值的 76%（以 2019 年水平计算）。SIR-Macro 模型预测结果显示，按照现有的疫情防控力度，如果奥密克戎疫情能够在未来 2-3 个月内清零，中国 2022 年 GDP 的增速将下降 1.3-2.0 个百分点，这显然对于 5.5% 的 GDP 增速目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实现经济平稳运行，需要以下几方面的政策配套：

1. 财政政策进一步宽松，降低企业税负，加大对服务业投资支持的力度；
2. 提高基建投资增速，增加医疗基础设施投入，缓解房地产投资下降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负向影响；
3. 继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保障就业；
4. 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配套来稳定预期，进一步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意义和挑战³

赵耀辉⁴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我对养老金制度这一话题的兴趣由来已久。我读本科时，老师就建议我研究瑞典的养老金制度。近40年过去了，我对这一话题的兴趣丝毫不减。

2022年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主要有三大原则，一是政府政策支持，二是个人自愿参加，三是市场化运营。《意见》非常清楚地定性了个人养老金私有财产的属性，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亮点。

私有财产属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一是占有权，主要体现在“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度，缴费完全由参加者个人承担，实行完全积累”。在这段表述中，“个人账户”是关键。

二是收益权，主要体现在这个账户“封闭运行，权益归参加者所有，除另有规定外不得提前支取”。此外，参加者可以用账户里的钱买银行理财、储蓄，也可以去买基金和投资金融产品，自己承担风险。

三是处分权，主要体现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内的资金可转移、可更换投资机构，也可以转移到别的账户。这是一个突破，类似的操作在以前是不允许的。

四是使用权，达到领取年龄，参加人个人养

老金账户里积累的钱只供自己使用。

在我看来，虽然个人养老金不是百分百的私有财产，但已经非常接近。除了“另有规定外不得提前支取”这一条外，其他部分已经相当于私有财产。

《意见》中也明确了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定位，是“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我们的养老保险体系已有两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这在一些效益好的大机构才会有，覆盖面不大。

在我看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意义绝不限于是对第一、第二养老保险支柱的补充。

我国养老金制度面临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16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一文，高度关注我国养老金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养老金制度。

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加快发展，我国社

3. 本文根据赵耀辉在2022年4月24日北大国发院第156期“朗润·格政”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4. 赵耀辉：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组负责人，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副主编，北京大学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的联合主任。

会保障体系仍存在不足。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有待提高，制度整合没有完全到位，制度之间的转移衔接不够顺畅。

第二，平衡地区收支矛盾压力比较大，有些地方社保基金存在“穿底”风险。

第三，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等人群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存在“漏保”“脱保”“断保”情况。

第四，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待遇差异不尽合理。

以上可以看作是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出台做的铺垫。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出台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

接下来，我将就目前我国养老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展开论述。

第一，各自为政带来的转移衔接问题。

目前我国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相互分割。不仅如此，每种制度在不同地区间执行的是属地化管理，不同地区之间没有打通。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能提高以上两种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已经基本实现，正向着全国统筹的方向推进。居民养老保险则正朝着市级统筹的方向努力，因为居民养老保险是从县级单位开始的。

我国有334个地级行政单位，简单计算下来，至少有33个职工养老保险资金池和300多个居民养老保险资金池，大家各自为政。人口流动和劳动力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的大趋势，因此一个人可能从居民养老保险进入职工养老保险，也可能反向流动、跨地区流动。在职工养老保险的范畴内，流动转移已经比较方便，然而居民养老保险的异地转移，以及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之间的转移流动都尚未实现。以前曾找过一些解决方案，但对参与者来说都不是最划算的方案。

第二，不同地区的养老金压力差异巨大。

关于养老金，有个专业术语叫“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意思是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与正在缴费的企业职工人数之比。在广东省，这一比例为9:1，意思是9个在职的企业职工负担1个退休职工的养老。但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只有约1.2个人负担1个退休职工，养老压力非常大。

毫无疑问，这反映了劳动力流动的结果。通过202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劳动力的流向。比如广东省等发达省份基本是人口净流入。我认为养老金压力的地区差异不是生育率差别导致的，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人们离开收入低的地方，前往收入高的地方。其后果是人口大量流出的省份面临社保基金赤字“穿底”的风险。

因此，《意见》中提到的解决方案非常合理。在我看来，这样的赤字风险不该由各省各自为政来解决，而应该全国统筹。比如说黑龙江省出现赤字，不应该由黑龙江省完全负担，因为这里的年轻人很多都跑到了广东省。

统筹解决的想法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提出，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仍在为实现全国统筹的最后一步而努力，可见这件事的难度有多大。

困难在哪里？

一是地方利益构成巨大阻力。一旦统筹政策落地，黑龙江省这样的人口流出地可能会非常愿意，但广东、浙江、上海、北京这些人口流入地可能不愿意。

二是道德风险。一旦政策落地，那些已经出现赤字的省份肯定希望短期内可以有钱入账，弥补赤字。很多地方之前出台过一项“允许补缴社保”的政策，即只要补交几万块钱的社保费用，就能在退休后继续领几十年退休金。因涉及道德风险，这项政策已经被制止。

第三，漏保、脱保、断保等问题层出不穷。

新的经济业态在发展，灵活就业越来越多。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 2 亿，占全国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外卖骑手这类平台灵活就业者就有 8400 万之多，占全国劳动力的十分之一，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通过平台灵活就业的这部分人群，绝大部分没有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这在网络上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前几年，我国曾推行社保不再由社保部门收缴，而是由税务部门收缴，相当于给许多企业施加了压力，让它们为职工投保。在新的形势下，过去常用的强制推行保险的做法不再有效，即使税务部门施压，也无法保障平台灵活就业者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大量的人员因此被排除在社会养老保险之外。这样带来的后果是民众没有养老保险，特别是现在年轻人老了以后没有养老保障。

在我看来，出台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帮助这部分缺乏保障的人，不让他们漏保，而不是为了保障那些高收入人群。

第四，待遇差异很大。

下面这张图，横轴代表不同的社保类型，纵轴代表保险覆盖率，不同颜色的柱子代表了从 2011 年到 2018 年发布的数据。从图中不难看出，城镇和农村户口社保覆盖率已经接近 100%，但城镇户口主要参与的是职工保险，覆盖率约为 66.8%。农村户口的居民主要参与的是新农保，也就是农村居民的保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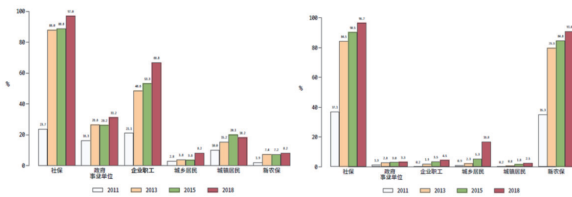


图 5.3: 城镇老年人口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

图 5.4: 农村老年人口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

中国健康养老追踪调查

居民保险能够提供的钱非常少，因此，几种主要养老保险的年养老金额度差异非常大。

下图 2018 年橘黄色部分代表职工养老保险养老金额度的中位数，约为 32000 块。非常小的

绿色部分代表的是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额度的中位数，一年大约为 1000 多块，两者差异非常大。如此大的差异，主要由保险类型不同所导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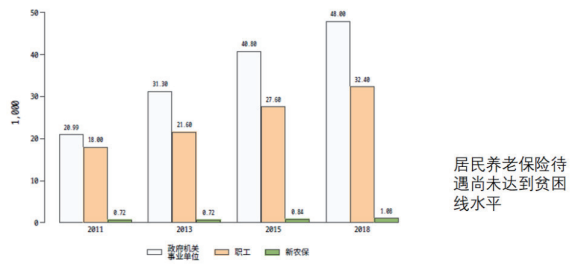


图 5.14: 主要养老保险年养老金额度 (中位数)

中国健康养老追踪调查

这样的养老金水平是否足够养老？下图是 2015 年时我们做的简单计算。我们选取的样本是尚未退休的，年龄在 50 岁 -60 岁之间的一部分人。

首先看他们当下有多少财富，再把预期的社保养老金折现到当下，以贫困线为标准，测算这部分人退休之后假使不再工作，养老金能否保障其生活水平高于贫困线之上。测算结果发现，如果只靠社保，农业户口居民中约有 88% 的人，退休后将生活在贫困中。加入其他财富后，这一比例会降低。即使这样，也有约 38% 的农村户口居民退休后将生活在贫困中。这意味着现在即将步入老年时代的这部分人口只靠养老金是不够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等到现在的年轻人退休时，仍没能攒够社保，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养老金不够用，老年人会迫于生计不停地奔波挣钱。

	农业户口	城镇户口	女性	男性	总体
社保财富	88.8	36.5	75.8	72.9	74.4
社保财富 + 耐用消费品 + 生产性固定资产 + 流动资金	73.8	29.2	65.3	57.5	61.5
+ 土地变现	63.2	28.1	57.6	49.2	53.5
+ 住房变现	46.4	17.7	42.8	33.9	38.5
+ 土地和住房都变现	38.1	17.0	36.8	27.5	32.3

注：50-60岁，假设了折现率和增长率，加权数字

实现以房养老将对降低老年贫困起到重要作用
家庭仍将是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要重视保护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历程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在上世纪 80 年代迎来一场改革——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分开。2015 年，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并入城镇职工保险。

居民养老保险始于 2009 年。从 2009 年开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覆盖农村居民。2012 年，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随之展开，很快覆盖了城镇无保障和无业人员。2014 年，城乡居民保险开始合并，2020 年完成。此后，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只要愿意加入，都可以拥有一种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设计

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存在很大问题。这项制度在上世纪 60 年代到 1986 这段时期内，是单位负责养老，随着国有和集体企业出现破产，需要转向社会养老。

从 1986 年开始，国有企业开始实施养老统筹，包括行业统筹和地域统筹。从 1991 年开始，开始实施个人缴费。

1997 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出台，确立了养老金采取统账结合的共识和缴费领取公式。“统”的部分单位缴费，最高比例为 20%，现在逐渐降低到 16%；有的地方则是单位缴费比例为 14%，个人缴费是 8%。

统账结合制度设计的初衷

所谓“统账结合”，有一部分是统，有一部分是账。其设计的初衷是希望通过个人账户来赋予大家缴费的积极性。但是个人账户并非个人财产，资金没有积累，空账运行，个人也没有收益权，资金不可转移。此外，按照这套制度的设计，养老金中 20% 都进入统筹，这与个人利益脱节，我认为这是导致参保积极性低下的关键原因。

参与的积极性对于养老保险十分关键，对此我们早有研究。我和徐建国教授早在 1999 年就

曾发表过两篇论文，指出“当前的转轨模式回避了缴费动机问题，导致了大量的拒缴和偷逃行为”。我们当时就建议要走市场化的路。具体措施包括要界定养老金的隐性债务，以账户方式分配到个人；养老基金账户要转为实账，要移交市场管理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个人账户新制度所做到的。

2001 年，我们又发文仔细分析了激励机制的问题。经过仔细计算后，我们得出结论，“激励机制设计的关键是减少‘大锅饭’成分，把企业和职工对养老金的贡献都存入个人账户，交由职业投资机构管理，以获得既安全、又不低于个人投资收益的合理回报”。“在合理的假设下，用 1% 的 GDP 就可以在 50 年内清偿现在的养老金债务，这相当于 5.6% 的工资税。而向个人账户贡献总共为 10.2% 的工资就可以实现个人账户的全额积累，并且提供替代率为 60% 的养老金收入。这两项加起来一共才占工资的 15.8%”。由此可见积极性有多重要。

与职工养老保险不同，居民养老保险则从一开始就是完全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制。所有的钱，包括自己的缴费以及政府为吸引缴费而给的补贴，都进入到个人账户里。然而这跟我们今天讲的个人账户还是有本质的差别。居民自己不能控制账户，这主要体现在不能自主选择投资管理机构、利率由政府决定、不能携带等问题。所以居民养老保险虽然是个人账户，而且是基金积累，好像还可以查余额，但参保的积极性仍旧不足。我认为，积极性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给予个人对自己账户充分的控制权和安全性，导致对居民养老保险信任度不足。

新形势下，缴费积极性愈发重要

在今天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积极性愈发重要。灵活就业、平台就业比例增大，年轻人大量地脱离职工社保体系，而我们的职工社保体系里面已经有大量的退休人员，需要不断有年轻人来承担老年人的养老金。

目前我国约有 8400 万平台灵活就业者，占



劳动力的 10%。如果大量年轻人转向灵活就业，大量的人员都离开了社保体系，谁来养目前的这些老年人？到时候社保基金的赤字一定越来越大，整个系统的抚养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同时，对年轻人来说，在挣钱最多的时代没有为自己攒下养老钱，退休后如果社保缺失，这部分人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此外，社保压力过大也会加速就业非正规化。政策缴费率包含养老、医疗、失业和生育，加起来占比约为 36.8%，公积金最低占比 10%，最高占比 24%。上述项目加在一起，总占比约为 46.8%。如果企业认真缴费，用工成本非常大。这意味着，企业每发 1000 块的工资，就要附加 400 块的社保。

这样的情况正在加速就业的非正规化。平台就业本来可以正规化，但因为缴费压力过大，不得不变成非正规的就业。因此，企业实际缴费率远远低于政策缴费率，通过压低工人数量、压低工人的工资额等方式降低缴费水平。这种行为无疑是劣币驱逐良币，惩罚了遵纪守法的企业和员工。针对这种情况，增加监管和稽查等手段都不太奏效，必须考虑提高积极性。人是理性的、自利的，要让参与者觉得划算，从而有积极性，这是经济学界的第一大法宝。

养老保险的制度选择

养老保险有两大类型，一个是 DB (defined benefit)，另一个 DC (defined contribution)。DB 是确定收益型，即在缴费前就知道参保人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DC 就是确定缴费型，即参保人知道自己要合计投入多少钱，至于退休后能拿到多少钱，这取决于回报。DC 基本上属于个人账户制度。

DB 和 DC 制度又可以分别细分为“有基金积累”和“无基金积累”。比如无基金积累的 DB 类似现收现付制度，简单说就是不积累，在

职工退休时，如果需要钱再从现在的职工手里收，这叫现收现付。

个人账户制度，又分名义账户和实际账户制度。名义账户就是先往账户里存了 100 块，然后马上用这 100 块给现在退休职工发钱，资金并没有真正在账户里留存，但仍然能看到账户里有多少钱。实际账户制度，意思是账户里的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制度选择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国选择何种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一是考虑是否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大量的转轨需求源自人口老龄化，这里面暗藏着年龄结构变化的风险，是否鼓励延迟退休也是要考虑的因素。

二是要考虑是否能提高参与积极性。很多制度没有考虑积极性问题，无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积累制，大部分国家都强制要求参与。为什么会强制要求？主要是预防短视。有些人只顾现在不管将来，这会令其在老年陷入贫困，终究还是社会为他买单。正因为最终社会都会买单，有些人会利用社会的同情心，故意不存钱，把钱花光，因为他知道，老了以后即便是陷入贫穷，国家和社会都会管我。但是，强制参与在很多的国家难以实行。

三是否有利于共同富裕，不能造成过大的贫富差距。

哪种制度更能抵御老龄化？

先来看现收现付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老年人的退休金完全靠年轻人缴费，当抚养比情况变差，年轻人的负担就会加重。下图是我们国家人口抚养比变化图，主要看 60 岁以上人口每人需要几个 20-59 岁年龄段的人来缴费。不难看出，近些年抚养比恶化得非常快。2000 年时 5.5: 1；2020 年时上升为 3: 1；2050 年，大概会要上升到 1.2: 1。

我国人口抚养比



因此，如果采用现收现付制度，并预设大家在60岁退休，意味着当时缴费的人需要拿出一半的钱给已经退休的人养老，这非常不可持续，不利于鼓励大家工作的积极性。

再来看个人账户制。如果采用名义账户制，这意味着钱无法积累，基本等同于现收现付制。如果采用基金积累制，老年人靠自己的储蓄生活，不靠年轻人，那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因此，基金积累制更优，更有利于老龄化。在我看来，这也是很多地方都在推行基金积累制的主要原因。

哪种制度鼓励延长就业？

当人口的预期寿命得到很大提升，国家必须考虑要延迟退休。否则一直按照60岁的标准来退休，抚养比很快达到1:1，这肯定不可持续。假设人口预期寿命达到90岁，退休年龄延到70岁，抚养比马上就会得到改善，这也是绝大部分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法宝。

在现收现付制度下，参保者会认为养老金是自己的“应得权利”。如果国家“中途变卦”，参保者会认为国家不守信用，可能因此抗拒延迟退休。如果采用个人账户制度，情况就会不一样。个人账户是个人财产，选择提前退休就意味着用有限的这些钱支撑更长时间的老年生活，平均每年拿到的钱会变少。如果延迟退休，就意味着

退休时能够有更高的年收入。因此，如果人口预期寿命升高，人们可能会更愿意延迟退休。从这个角度看，个人账户制更优。

发达国家通常是现收现付制度。许多发达国家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冲击，财政上出现很大赤字。这些国家在设计养老金制度时，还没有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因此当时没想到今天有如此多的问题。如今这些国家在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上举步维艰，各种政治势力在选举拉票时都打着“不能让大家延迟退休”的旗号，承诺一定保证退休者的福利等。因此，发达国家采用的现收现付制，已经吃足教训。

目前，美国通过发展补充保险，已经大大降低了社保作为第一支柱的重要性，即企业养老金成为越来越强的第二支柱，已经超过第一支柱。美国也很想改革，共和党和民主党为此争斗多年，希望能够实现私有化的社会保障。虽然目前这一目标尚未实现，但美国已经通过扩大第三支柱的方式，实现了养老金制度的较大转变。

哪种制度鼓励缴费？

在现收现付制度之下，缴费是为了获得领取的权利。多缴不会多得，所以只要缴费年限达到一定标准，参保者就能拿到养老金。这种制度容易鼓励最低的标准缴费，以此来“占便宜”。只要达到最低标准缴费，整个分配制度对低缴费人群有利，高缴费人群的钱会被拿来补贴低缴费人群。这样的制度虽然能鼓励大家都参与，但是不会鼓励大家多缴费。

而在个人账户制度下，账户是个人财产，多缴多得，积极性最大化。所以这种制度不仅鼓励缴费，并且鼓励多缴费。

哪种制度有利于共同富裕？

乍看可能大家认为是现收现付制。现收现付制度有再分配的功能，可以补偿低收入参与者。个人账户制度则没有再分配。表面上看现收现付制度有利于共同富裕，但由于很多人不参与，或



者是以最低水平参与，使得现收现付制度实际积累的养老金权益可能更低。参保者只得到最低层次的养老金，或者干脆就不参与，没有养老金。因此，在现收现付制度下，反而会造就更多穷人。

个人账户制虽不完美，但可以辅以配套措施。

一、要搭配最大化参与的激励措施，预防老年贫困。鼓励所有人都去参与缴费，即使参保人收入不高，依然可以缴费。这样的措施可以帮助每个参保人预防老年贫困。

二、要对一生低收入者有扶贫措施。这两项功能不可混在一起，即扶贫不要扭曲养老保险对参与者的激励。

个人账户养老金吸引力在哪？

如果个人账户做得好，实际上可能降低贫困。这一论断的基础就是“人有天然的储蓄动机”。人老之后，挣钱能力下降，消费需求上升。终有一日，个人收入将没有办法支持消费，因此必须要有储蓄的安排。

或许大家会问，我自己的钱可以放在自己的储蓄账户，为什么要存在政府的账户里？这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的收益有限，散户很容易被“割韭菜”。投资机构是专业的，知道如何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但这样的机构一般都设有最低投资额要求，低收入者很难达到这一标准。因此，一般情况下老百姓理财只能靠银行。但在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下，会有来自很多人的小笔资金汇集到一起，交给机构投资者理财，收益自然也更高。对老百姓而言，这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吸引人的地方。

为什么会有老年贫困？

老年贫困可能是导致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生都属于低收入群体的人，其陷入老年贫困的概率也比较大，即使按时

缴费也无法满足其老年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部分人的养老需求应该由政府救济来承担，而不是靠养老保险来负担。新加坡有个 Workfare 项目，该项目在补贴低收入群体的同时也鼓励就业。那些积极就业的人，能拿到更多的补贴。这些补贴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直接进入个人账户，帮助这些低收入者未来养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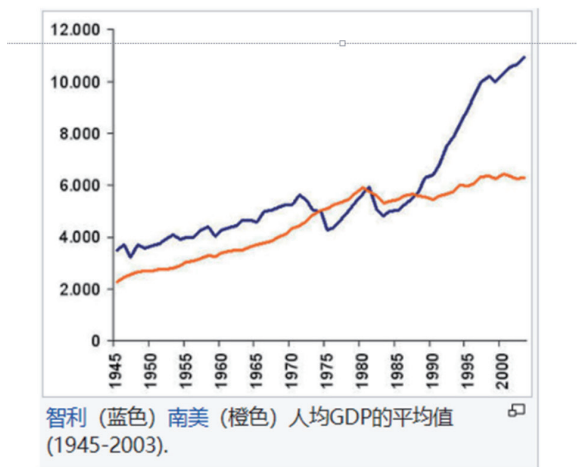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安排。那些一生都不缴费的人，一般也是被社会保障制度“遗漏”的人，他们多数是自我雇佣的灵活就业者。一般的强制性保险不会覆盖到他们，因为很难确定他们的收入是多少，征缴也非常困难。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自雇比例少，较容易实现强制性社会保险。然而在中低收入国家普遍存在大量的自雇人群，这其中也包括农民。如何吸引自雇者参保？这非常重要。智利和新加坡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案，结局也大不相同。

智利养老保险

智利在 1981 年就设立了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这是对之前现收现付制度的革命性改革。之前的现收现付制度早已面临危机。1971 年，智利养老金支出的 GDP 占比高达 17%，当时有 100 多种资金池子，错综复杂的利益使改革无法推行。因此，智利政府提高了储蓄率，推动了金融市场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下图中蓝线代表智利人均 GDP，黄色代表南美人均 GDP。不难看出，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后，智利出现经济的奇迹，实现经济腾飞，与拉美国家拉开很大距离。智利也因此成为世界银行推崇的典范。

在上世纪 90 年代，包括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乌拉圭、墨西哥、波兰、俄罗斯和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纷纷推行与智利相同的养老金模式。不可否认，智利的制度在当时的确是成功的，成为了全世界仿效的对象。



然而现在看来,智利的制度有两大设计缺陷。一是参保率低。南美国家有大量自雇人群,几乎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是灵活就业。这些人不进入正规社保体系,不进入强制缴费的范畴。20多年后,智利政府发现几乎一半的人口都没有参保,即便参保的人,也有一半是低水平参保,根本没有持续缴费。许多智利人发现,退休后能拿到的养老金非常少。

智利在2008年设立“团结养老金”(Solidarity pension),向未参保和保障水平低者提供最低养老金。然而这一养老金覆盖了近60%的人口,这不是救困,而是拿参保者的钱去普遍地发福利。2015年,智利再次大幅提升保障水平,远超贫困线。这样的举措大大挫伤了参保者的积极性,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参保,因为参保反而可能导致拿不到钱。

在新冠疫情期间,智利大量参保人要求政府归还先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智利政府也曾多次允许参保者取现。毫无疑问,这些钱一旦出去就不会再回来。

因此智利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目前面临解体,很多拉美国家也是如此。多数拉美国家顺势解散了个人账户制度,重新回到现收现付。

新加坡养老金制度

1955年,新加坡建立了自己的养老制度——

中央公积金制度。从时间上看,这一制度建立于英国统治期间。英国不想承担殖民地老百姓的养老问题,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殖民地老百姓自己负担。

就目前情况来看,新加坡采取的这种制度,非常具有生命力,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小,运行非常良好。

这一制度的关键是受雇者强制性缴费,完全基金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参保人可以自主决定投资机构,也可以自主选择由政府担保的无风险投资。在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也有大量自雇人群。新加坡政府对于低收入或者自雇者没有强制,而是通过利息补贴来吸引这部分人参保。根据最近我查到的数据,新加坡人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只要有6万新币,国家就会补贴1个百分点利息。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免税的方式,鼓励子女为低收入的父母缴费。

此外,新加坡政府只会出面救助那些无赡养人并且一生收入都很低的老年人。对于有赡养人的低收入老年人,新加坡政府主张强化子女赡养责任。救助方式并不是简单的发钱,有时候是以提供医疗、子女免费上学等实物的方式来进行。在我看来,新加坡政府的成功之处在于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责任,通过一种非常聪明的设计,让政府仅仅起到了兜底作用。

个人账户制度还有哪些优势?

综合来看,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制度之间转移衔接、解决地区压力不平衡问题以及待遇差异,这些问题和目标都可以在个人账户的框架下得到解决。

比如提高统筹层次这个问题,如果把个人历史上积累的养老金权益落实到个人账户,然后把账户转移到中央社保机构统一管理,这样一来,参保人的养老账户控制权就不再受制于地方政府。同时,居民养老保险的余额也可以直接并入个人养老金,因为这个余额定义得非常清楚,如果能够直接并入个人养老金账户,参保人的这一财产



也不再受地方政府支配。

前两项解决以后，转移也不再是问题。至于待遇差异问题，主要由缴费差异导致，需要个人为自己负责。

综上，个人账户制度不是简单的第三支柱，而是具有潜在革命性意义的一种制度。

小结

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通过强化个人责任并提高积极性，有利于防范人口老龄化风险，提高养老金保障水平。如果开始这几年运行顺利的话，可以为下一步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打下基础，实现全国统一的制度。

推出个人养老金制度后，居民养老保险最适合尽快地并入。如果能够把职工养老保险也逐步并入，则可以一次性解决转移接续、统筹层次、参保积极性等长期困扰社保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一个原则是，个人账户制度需要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兜底。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性债务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棘手的、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此外，我认为应该有一些额外的激励措施。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主要是为未参保、或者参保层次低的这些灵活就业人员设计。然而这部分人群由于个人投资选项少，本身就没有太多的钱可以存入账户。目前居民养老保险是有缴费补贴的，有些地方存 1500 块，最高可得到 100 块补贴，

以及利息补贴。这些收益加在一起，已经远远高于实际的三年期定期存款利息。

我认为这些补贴可以转为针对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利息补贴，而不是现金补贴。我们可以参照新加坡的做法，补贴前面一定的量。比如说这个账户里 10 万元是参保人的投资额，政府可以针对这一部分给予补贴。这样的话，至少每个人在退休前，可以有一个固定的 10 万到 15 万的账户余额来保障其退休之后的基本生活。此外，针对高收入人群，可以允许参保人为其他的低收入家庭成员缴费，比如可以为家中不工作的配偶和低收入父母缴费，以此获得税收优惠等。

最后，鼓励参与也有其他一些必要条件，最主要是信息要透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可以建一个平台，提供各个可选基金管理机构的投资成绩单，让投资者了解不同类型风险 - 收益组合，做出自己的选择。针对个人账户，参保人要随时可以查询余额、查询投资回报，最好在手机端就可以操作。

目前，针对资金管理的细节还需要敲定，比如如何降低管理费，如何规定账户移动频率，有效控制基金管理公司风险，以及为风险耐受力低的人提供购买国债的优先权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问题。

我们也要开展全民投资知识普及。个人养老金账户好比是突然出现的一个投资选项，如何用好这一选项，管理好风险，相信大家都需要一定的启蒙教育。

《职业教育法》修订与中国教育的必要改革⁵

姚洋⁶

北大国发院院长、东南大学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对最新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和我国中等教育的一些看法。

我作为经济学家关注教育问题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经济学家关注教育问题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而我自己也做过一些关于教育问题的研究。

第二，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西汉开始有举孝廉制度，隋代开始实行科举考试，中国人在1500年前就开始重视家庭教育。当下，教育问题更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特别是中小学教育。过去由于生活水平较低，很多农村家庭没那么关注教育，但最近十年来几乎每个家庭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子女教育。

在这样的舆论场里，我觉得经济学家不应该缺席。我个人认为，因为拥有很好的分析工具和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所以经济学家做教育研究可能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成果。

大家现在都能感受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家长都被巨大的教育焦虑所笼罩。孩子之间、家长之间的互相竞争导致“内卷”，形成焦虑，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有社会新闻说，年轻的妈妈们被孩子的教育折磨得异常焦虑，甚至出现了精神问题。可见，教育已经变成当下一个普遍存在、被普遍关注、亟待改进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普

职分流”问题。

我国现行的九年义务教育是指从小学到初中实行义务教育。过去30年，政府提倡义务教育结束后要对学生进行分流，根据中考分数线去就读普通高中或者职业高中，并且硬性规定了分流比例。因此，现在的孩子所面临的中考压力要高于高考压力，因为如果考不上普高，就只有选择职高，最后接受职业教育。对此，大多数父母都不甘心，于是出现了严重的焦虑情绪。

我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做了妈妈，每次听她们聊的最多的就是孩子教育，并且能感受到她们的焦虑情绪。当社会被这样的焦虑情绪笼罩时，我们的生活质量、社会活力都会下降，最终也会影响我们GDP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包括几个方面：

- 第一，新版《职业教育法》的新内容；
- 第二，我国的教育现状和产业需求；
- 第三，我们目前需要什么样的中等教育；
- 第四，我对义务教育的一些看法。

新版《职业教育法》的修订要点

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5. 本文根据姚洋在2022年5月13日北大国发院第157期“朗润·格政”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6.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东南大学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40人论坛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正式生效实施。这是自 1996 年《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后，时隔 26 年的首次全面重大修订。

新版《职业教育法》中出现了哪些新内容？

第一，新版《职业教育法》的“第三条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用。此外，新版去掉了旧版的“第十二条 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整句表述。旧版《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初中之后要实施教育分流，即一部分孩子上普通高中，一部分上职业高中。新版《职业教育法》中去掉了第十二条中关于“分流”的整句内容。这是新版《职业教育法》相较于旧版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结合新版所提出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我个人的理解是，既然新版没有表述“不分流”或者“要分流”，那就意味着“不一定分流”。旧版《职业教育法》规定要实施强制性教育分流，即每个城市通过制定中考分数线，让分数线以上的孩子上普高，而分数线以下的孩子只能选择职高，二者的人数之比通常为“50:50”或者“60:40”。这种强制性的教育分流政策，正是当下导致家长们焦虑的罪魁祸首之一。

第二，新版《职业教育法》新增了“第五十三条 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在新版实施前，职高毕业生也可以升入本科，只是一个省的录取率只有 4%-5%，远低于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本科录取率，而其他的职高毕业生则只能升入高职院校读专科。因此，新版《职业教育法》打破了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学生之间的升学界限，拓宽了职业高中毕业生的发展路径，保障了职业高中毕业生拥有更加公平的升学机会，这是新版蕴含的一个巨大变化。为了满足更多职业高中学生的升学要求，预计今后职业学校会加强对学生的文化课教学，提高职业学校综合教育教学质量。

第三，新版《职业教育法》的“第十五条 职业学校教育分为中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新版将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层次提升到本科以上学历层次。以前的高职院校只有专科，而现在意味着高职院校也可以办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前几年，教育部曾规划将我国的 1200 余所本科院校进行分类，其中一半划为技术类大学。按照我们现在对职业教育的理解，技术类大学就是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学，专门培养技术类人才或者高级产业工人。

上述三点是新版《职业教育法》的新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当然，因为立法都是明确一些原则性问题，具体在实施过程中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下一步怎么搞好我国的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立法是第一步，但只是开启了一扇门，之后如何来设计我国的中等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的教育现状和产业需求

一方面，我国中等教育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我国从 1987 年开始正式实施《义务教育法》，30 多年过去，如今仍然存在义务教育发展区域不均衡问题。尽管我国城市地区的教育水平增长较快，但依据北大的调查数据，我国农村地区年轻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九年，这意味着许多农村地区的孩子还没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就选择出去打工。此外，我国城镇地区年轻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未达到 12 年。

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教育部公布，2021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7.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教育

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适龄人口是指在18岁-22岁年龄段的人口数。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 - 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目前，我国一线城市普通高中的高考升学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这意味着只要孩子考上普高就基本上能考上大学，哪怕考不上本科也能考上大专。

同时，75%的职高毕业生上本科或者专科，可见我国青年对于职业教育的需求不再是以就业为导向，而是以追求升学为主。

有人可能会说，身边很多职高毕业生都选择了就业，比如做厨师、理发师。没错，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在过去被称为“手艺人”，这些专业比较好找工作，所以这些专业的职高毕业生就业的比例很高。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职高毕业生的主要出路还是升学，因为选择升学对他们来说越来越容易。现在许多高职院校（大专）甚至三本大学都面临招生困难的问题，因此这些学校的录取分数都非常低，低到只要学生报考就基本会被录取。这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同时也导致孩子们面临的竞争从高等教育前移到中等教育，从高考变成了中考。

从产业需求来看，当下一些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以为我国产业发展需要的还是那种非常低端的劳动力，或者说只受过一些简单培训就能上岗的劳动力，而这种认知已经严重落后于我国的产业现状。

我国的产业发展到今天，主要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两类。

一是制造业。我国制造业的就业占比自2010年开始下降，甚至整个工业的就业占比都在下降，这是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必经阶段。目前，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仅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15%。全国就业人员总数是指我国的7亿劳动

力，包括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

制造业就业人员可以分成高端工人和低端工人。

高端工人通常需要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因为他们需要掌握诸如操作数控车床、编程等技术，而职高毕业生往往胜任不了这些要求。我们到很多优秀企业调研时发现，他们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低端工人通常是指在流水线上生产的工人，他们通常只需完成简单的操作，比如给产品钉一颗钉子，然后产品再去到下一道工序。对于这样的简单技能，工人通常只需接受几周甚至更短时间的培训就可以上岗，根本不需要职高毕业，初中生甚至小学生都能胜任。比如在我老家江西省新干县，过去十年经济大发展时期，吸引很多箱包产业和灯具产业回乡发展，也带动了当地老百姓的就业。我的侄子、侄媳妇都因此去到工厂上班，他们文化水平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毕业，但他们完全可以胜任在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作要求。

二是服务业。一般的服务业岗位也不需要长时间的培训，比如饭店服务员通常经过三个月的岗前培训就可以正式上岗。只有那些所谓“手艺人”，比如厨师、理发师、车工、木工等，才需要经过比较系统和严格的培训。

三是产业辅助性服务业，这也是服务业的一种，即服务于制造业的服务业。产业辅助性服务业提供的工资水平较高且用工需求非常大，比如我们常说的“码农”。我们去高科技企业调研时发现，办公室密密麻麻的格子间里坐满了码农，因此产业辅助性服务业是新型的劳动力密集性产业。码农们通常需要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大都是本科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换句话说，职高毕业生做不了码农。

四是金融、地产、教育等服务业。这些行业对就业者的文化水平要求更高，很多金融部门或教育机构对员工学历都要求硕士以上。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产业在不断升级，对劳动力的要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还会持续变化。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业一定要关注未来10年甚至15年以后的劳动力需求。到2035年，我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如果还不能普及高中教育，恐怕很难符合全面现代化的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去思考怎样普及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等教育？

结合我国教育的现状和产业需求，我重点讲一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等教育。

现在流行的观点是，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应该是选拔制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从孩子上幼儿园就开始焦虑，并且一直焦虑到幼升小、小升初，直到中考。当整个社会都处于严重的焦虑情绪中，很多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浪费性”学习。

我负责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发院前身）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当时我们对招收硕士生的标准有过深刻的讨论。有老师认为，应该只招免试推荐的学生，因为这样的学生基础比较扎实；也有老师认为，应该给其他学生留一些机会，让他们可以考进来。后来我看了这十几年我们硕士生的学业和就业情况，发现当初免试推荐进来的学生和自己考进来的学生在学业和就业上的差别不大，真正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因素是他们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本科所在学校的层次（如是否属于国内的top5），而这一结果让我非常吃惊。

因此，我认为高考就是考你的智商和学习态度（母亲的影响），其中又以智商为主。既然是以考智商为主，问题的关键就不是题出的难易程度。无论题目难易，最后考上清华或北大的基本上还是那些既聪明又认知到学习重要性的人。

社会焦虑情绪下的浪费性学习最后会导致经

济学所说的“无谓损失 (deadweight loss)”。什么是“无谓损失”？你如果在市场上做生意赔了，其实你赔的钱没有消失，而是被别人赚走了，对整个市场来说没有任何变化。“无谓损失”指的是虽然你赔了，但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从中赚到。比如，某个孩子每晚从10点学到凌晨2点，看起来非常辛苦，但这4个小时的学习可能就是“无谓损失”，因为无论他学多晚，只要大家都这么学习，最后他能考上的大学还是差不多。因此，所有人为考试选拔而进行的过度学习，就是“无谓损失”。

因此，当下这种以选拔为龙头，而且选拔节点不断前移的教育体制非常害人，再说远一点、大一点，这是在扼杀民族的创造力。

有一位企业家曾发邮件给我，说我谈到的一些关于教育的问题非常好，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未来，他为此资助我们国发院开展相关研究，于是我们有了现在专门的研究团队。他资助我们研究的动力来源于他儿子的经历。他儿子在美国读书，初中时成绩不好，到了高中才突飞猛进，他觉得如果他儿子在国内读书，很可能因为考不上高中而被分流去上职高。

当下这种过度重视早期选拔、层层选拔体制的教育把升学压力不断前移，而且让孩子全程都没有可以松口气的时候。于是从小学阶段开始，学校就只教给孩子的如何考试，忽视了引导孩子创造力的培养和发挥。

我在国外留学时看到很多例子，一些中国留学生前两年在班上出类拔萃，成绩明显优于同班的美国同学，但到第三年写论文时就犯难，因为缺少创造力而找不到好题目，最后甚至有人因此退学。

国内的应试教育只是让学生习惯了按照老师的题目要求去解题，当我们进入创新型社会，如果还是沿用以往的方式来培养孩子，恐怕最后就是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而这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教育的本质不是选拔，而是培养完整的人

我们的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和幼儿园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源——培养完整的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育是让他/她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高尚的人以及具有远大理想的人，让他/她不被眼前的刷题所束缚、不要成为蝇营苟苟的人。这才应是我们培养人的目标。

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说漂亮话。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内容之一是共产主义学说，而共产主义的根本追求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全体人类解放的前提。自由意味着每个人不受外力的干扰，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应该把培养人的目标定在如何挖掘个人潜能上，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一个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警醒那些以魔鬼式学习和掐尖式选拔为教育宗旨的所谓名牌中学，他们把整个中国的教育风气都带坏了，制造一些毫无必要的竞争。比如北大附中是想培养完整的人，让孩子们发挥自身潜能，但却受到来自斜对面中学的巨大压力，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情。那些所谓超级中学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顿悟，他们这样的做法会毁掉我们民族的未来。

可是，我这种说法会被很多教育界的人嘲笑，因为他们认为魔鬼式学习和掐尖式选拔才是最好的教育体制。我认为这是严重错误的，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也不符合每个孩子和每位家长的真正追求。哪位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学习到深夜两点，最后成为一个解题机器？哪个孩子又愿意这么去做？教育工作者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孩子都逼上独木桥？有人会辩解说，社会到处都是竞争，选拔制教育只

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和缩影。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可以从体制上改变这一点，也应该从体制上改变这一点。

我不反对学习，也不反对选拔，美国的孩子也是注重学习的，美国的高校也是选拔的，只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早地让孩子进入魔鬼式学习和踩踏式选拔。未来的中国要走向创新发展，最需要的不是恶性竞争能力，而是创造力。

路就在我们脚下，问题是可以改善的，我们的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和幼儿园教育问题是可以不那么恶性竞争、残酷选拔的。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一定要重视。

第二，教育不公平是共同富裕的重大障碍

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立志要建设一个平等、富强、公平的社会。否则，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我可以公开说，教育领域是我们当下最不平等领域。共产党的理念是进步的，可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是退步的。退步表现在哪里？我国城乡教育差距在过去几十年几乎没有变化，大城市的高等教育都普及了，但农村年轻人很多还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从数据来看，我们研究了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人口，发现出生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人，他们的教育水平与父辈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最低，相关系数只有0.35，与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这说明当时我国穷苦人的教育水平提升得较快。而现在，这一相关系数上升为0.5至0.6，已经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会打洞”的年代。

我读书在北大，工作也在北大。在我读书时，班里35人中有三分之一来自贫困家庭，甚至还有两名同学是孤儿。今天我在北大上300人的大课时，问哪些同学的双亲是农民？全场大概只有两三个同学举手。当下的北大已经非常精英化。



不仅如此，北大的学费 25 年都没涨过。我 1997 年回国，当时北大的学费是 5000 元一年，到今天仍然是 5000 元一年，但现在国内许多三本院校的学费已经高达 8 万元一年，民办高职院校也要靠学费活着。上这些学校的孩子多数来自农村地区，这意味着我们相当于给农村家庭制造了一个双重的惩罚机制：一重惩罚是农村家庭的孩子考上精英大学的概率很低；另一重是即便考上差的大学，还要面临比精英大学贵数倍的学费。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们也去调研了职高和技校，发现 90% 的孩子都是来自农村家庭。这些现象正常吗？

我们现在谈发展职业教育，有人美其名曰是因为孩子们有不同的兴趣和特长，比如逻辑思维能力强的就应该上普通高中，动手能力强的就应该上职高。农村的孩子更多地进职高和技校，难道意味着农村的孩子天生都是所谓逻辑思维能力不太强的人？显然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智力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是平均的，不可能城市家庭的孩子就天生逻辑思维能力强，而农村家庭的孩子就天生动手能力强。可能的情况只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已经成为阶层固化的工具。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应该去打破这个工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样的现象长期存在下去。

我们也做过研究，发现一个孩子一旦上了职业高中，他的职业就基本被锁定在低回报行业中的低回报工种里，甚至一生都不可能再有变化。他们就业后的收入和上过普高的毕业生收入差距会一直存在。如此一来，我们的职业教育不就成了阶层固化的工具吗？

中考后的强制性分流，还造成了家庭选择的下移，特别是农村家庭，在孩子要初中毕业时就不得不考虑孩子的未来，而且经济成为重要的决策因素。因为只要孩子的成绩稍微不好，就只能去上职高，最好的出路是毕业后升学上一个高职院校读大专。另外一条路就是初中毕业后就直接去打工，比如做流水线工人，月入 3000 元不难。

我侄子、侄媳妇都在流水线上工作，收入一个月四五千。试想一下，从职高到高职的六年时间，读书要交昂贵的学习，打工每年能有数万元收入，里外反差能达到 40 万左右。

对于家庭而言，只要不是孩子在学习上特别有前途，最理性的选择就是让孩子初中毕业后直接去打工。这样一来，中考后的强制分流只是加剧了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成为我们共同富裕目标的最大障碍。

第三，职业教育不能忽视知识学习与人格培养

大家可能会说，你为什么如此反对职业教育？因为我们去调研时发现，搞中等职业教育的人从骨子里就觉得我国还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普通劳动力，他们内心深处就把职业教育矮化了，尽管他们总是强调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们每个人都在从事一份职业，老师是一份职业，工人也是一份职业，为什么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把大家的职业分类呢？一名负责职业教育的政府官员告诉我，当年德国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给老百姓安排出路让他们去做工人，于是美其名曰为“职业教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事一份职业，因此没有必要分职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

这次新版《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认为是正确的。

还有人说，搞职业教育是要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我觉得这还停留在 30 年前的思维，认为劳动就指苦干，比如像当年要年轻人上山下乡或是到农村去吃苦一样，通过苦干的方式来培养年轻人的劳动精神，但现代社会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方式。培养劳动习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培养动手习惯”，所有孩子都应该培养动手习惯。我在成都调研时看到小学生们在学编程，他们通过编程、组装并焊接完成了一辆遥控车。虽然做的东西很简单，但是孩子们边做边玩，乐在其中。这就是与时俱进培养孩子动手习惯和创造力的很好方式。

当下我们很多职业教育只教学生程式化的技能，不讲解背后的原理，这是最致命的一个缺陷。我们去职业高中调研，孩子们都照着程序做而不问为什么，老师也不告诉孩子们为什么，只教操作程序。于是，这种所谓的培养动手能力，最后只停留在肌肉能力，脑力没有提高，一旦这个工种被机器替代，这些人学习和转岗的能力非常有限。

既然大多数职高毕业生要上高职，我们就应该先在职高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等升入了高职院校后再培养动手能力，这样也学得更快。

职业教育普遍轻视文化课。现在很多高职院校因为招生较难，文化课招生分数线都降到200分左右，这意味着学生不用学习太多文化课就能考上高职院校。但文化课于孩子一生的影响都非常重要。一个孩子如果错过了高中的语文课，就没有阅读到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今后也很难培养阅读的习惯；如果错过了高中物理课，就不懂得基本的物理世界怎么运作；如果错过了高中的政治经济学课，就不知道这个社会如何运作。这样的孩子在职高毕业后两眼一抹黑，这个人是不完整的，他很可能最后就变成了网上的“喷子”。而且，美好的高中生活值得人一生去回忆，比如可能遇到那些引导你建立世界观的好老师。我很庆幸，上高一时遇到了一位极好的语文老师，不仅她在课堂上讲授的知识让我们听得心潮澎湃，而且她还带我们去骑车郊游、去夜爬华山。那些经历是我一生的宝贵回忆。因为高中阶段是我们每个人开始形成自己世界观的时候，但凡有一位好老师点拨一下，我们可能终生受益。

对义务教育改革的建议

我认为当下最好的教育改革方案是从小学到

高中实施十年一贯制的义务教育。目前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时间总共是12年，但其中有两年浪费在“刷题”上，即中考和高考之前的最后一年。因此我认为，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时间可以缩短为10年。

具体而言，让孩子满6岁后先上学前班以适应小学生活，等满7岁后再正式就读小学；小学和中学都安排为五年制教学，且不再区分初中和高中；17岁中学毕业后可以选择考本科或专科，也可以去上技校或中专，当然也可以直接就业。一些本科院校可以开设预科，让已经录取的学生先学习预热一年。这样一来，每个孩子都可以接受完整的中学教育。17、8岁以后，孩子心智成熟了，家长和孩子都清楚了是否有考上本科的能力，这时再依据自身情况选择下一步的路。

当然，上述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改革方案。在新版《职业教育法》出来之后，作为过渡，我认为我们至少要做到两点。

第一，取消中考后的强制分流。家长和孩子可以自由选择是去读普高还是职高。

第二，给予地方教育部门自主权。让各省自行决定要不要中考后实施教育分流、怎么分流以及怎么去办中等教育。

此外，每所学校都应要求孩子掌握一些劳动技能，可以学编程，也可以学车工，等等。如果不是每所学校都具备开展劳动技能课的硬件条件，那么可以在一个县或是一个区集中建设一些劳动技能培训中心，就像当年的少年文化宫一样，对孩子们开放。

综上，唯有对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创新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实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应该有的样子。



应加强而不是削弱平台经济创新能力⁷

黄益平⁸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平台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第一次有机会紧随工业革命的步伐,走在了国际经济技术创新的前列,治理政策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平台经济的创新能力。

近日,印度商业与工业部长戈亚尔宣称印度的新兴独角兽公司数量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戈亚尔引述的数据应该来自位于旧金山专注初创公司及投资机构生态的企业服务数据库公司Crunchbase。新兴独角兽公司是指那些估值在5-10亿美元之间的创业公司。根据最新榜单,中国的新兴独角兽公司有27家,落后于印度的32家。过去在业内曾经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全球平台经济三分天下——美国、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在2020年6月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排行榜上,前三名分别是美国(228家)、中国(122家)和英国(25家)。但如果看新增独角兽公司的数量,2018年以来中美差距已经显著拉大(见图1)。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2021年初以来的平台经济“强监管”政策可能加速了这个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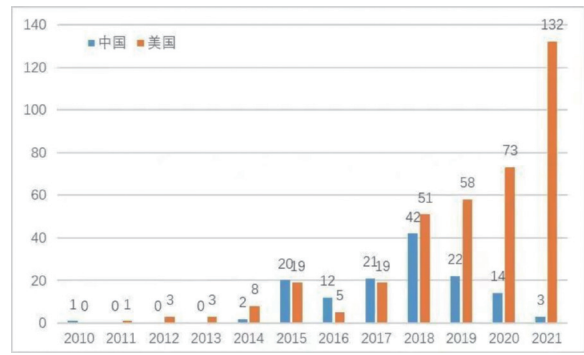


图 1: 近年来中美新增独角兽公司数量显著分化
数据来源: 勾股大数据。

所谓平台经济,是指一种依托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工具的新经济模式,其主要业务包括撮合交易、传输内容和管理流程。因此,平台经济是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平台企业的发展是从1994年接入互联网之后开始的,一批国产的互联网公司很

7.本文为北大国发院“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课题组与中新经纬合作推出的系列评论文章《承泽观察·平台经济40评》的第一评。

8.黄益平:北大国发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目前还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2018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为外部监督顾问小组成员(Member of The External Advisory Group on Surveillance)。

快应运而生，包括瀛海威（1995年）、搜狐（1998年）、网易（1997年）、腾讯和新浪（1998年）、阿里巴巴（1999年）和百度（2000年）。二十几年来，这个行业一直在不断地洗牌，早年成立的公司，有的至今依然站在创新的前列，有的早已销声匿迹。之后又冒出来不少新的头部平台，比如美团、滴滴、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即便与美国的一些头部平台如谷歌、脸书、推特等相比，国内的这些先行者起步也不晚。在2019年之前，看独角兽公司的数量，中美几乎是平秋色的，但之后开始明显落伍，许多头部平台的估值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几乎腰斩甚至缩水更多。

平台经济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包括生活方式甚至生产方式的转变，但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让中国第一次有机会紧随工业革命的步伐，走在了国际经济技术创新的前列。之前人类社会已经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蒸汽机技术、电力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突破口，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产业，但过去中国离新兴产业的距离一直非常远。在这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虽然中国的平台企业并不拥有很多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但在电商、外卖、网约车、社交和短视频等领域的业务创新，并不落后于国际同行。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粗放式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平台经济的活力持续减弱，不仅会加大短期的增长下行压力，甚至有可能影响长期的经济创新能力。

中国的平台经济能够弯道超车，实现快速发展，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为重要的两大贡献因素是数字技术进步与市场化改革。如果没有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和移动信号，数字平台也就无从谈起。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渗透率都是显著领先的，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同样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不管身居何处，只要有智能手机、有移动信号，几乎就能享受同样水平的平台经济服务。这既反映了中国平台经济发达的程度，也体现了平台经济服务很强的普惠性。同样，市场化改革也功不

可没。几乎所有的平台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它们都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其中一部分在短短的几年间做成了全球领先的平台，它们正是“中国梦”的成功案例。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在平台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因为平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规模经济，而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为平台经济创新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试验场所。其次是中国过去对个人权益保护的相对水平较低。最突出的领域就是数据的搜集与分析，“数据是新经济的石油”，没有数据，也就不会有平台经济。不过，中国一些平台企业违规甚至违法搜集、分析数据的现象十分普遍。从积极的角度看，创新活动非常活跃，涌现了许多新的产品与模式；从消极的视角看，侵犯隐私、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最后是国内、国际市场的相对分隔。这样就使得国内平台可以暂时免于遭受国际平台的竞争冲击，为它们在初创期实现快速发展赢得了一些时间与空间。但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充分，还是与国际市场相对分离，都不是长期可持续的。

平台经济带来的创新活力是有目共睹的。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创新创业的门槛，在线上开业提供销售、教学等商业服务的固定成本比线下低许多，很多低技能的劳动者也通过平台经济找到了灵活的就业机会。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如何发展普惠金融，为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家庭提供金融服务，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而平台经济中的两大工具即平台与数据却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克服“获客难”和“风控难”的问题，为大量的普惠金融客户提供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金融服务。正是基于平台的优势，中国的一些数字金融业务，特别是移动支付、线上投资、大科技信贷和央行数字货币，已经走在了全球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前列。从宏观层面看，平台企业是中国最为活跃的经济部门，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平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也出现



了不少问题。个人权益保护不足只是一个方面，事实上平台经济的许多特性，比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效应、双边市场等，既可以带来好的回报，也可能造成新的问题，比如垄断现象、反竞争行为、歧视性定价、财富高度集中和影响社会秩序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不但平台经济发展很容易走偏，甚至还会干扰宏观经济的稳定局面。政府高度重视这些问题，2020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了要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由此于2021年初开启了被普遍称为“强监管”的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相关部门纷纷出台了一些监管政策并采取了监管举措。不过，决策部门一再强调，平台经济治理的目的，是要实现“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可惜的是，在最近这段时期内，中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势发生逆转，几乎所有头部平台的市场估值都已经大幅缩水，流入平台经济的投资逐季减少，很多平台都在裁员，几家主要平台的创始人纷纷退休。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最新数据，2022年一季度互联网投融资金融同比减少76.7%。中国平台经济与美国的差距显著扩大，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和亚洲的平台企业发展却十分迅猛，印度的新兴独角兽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中国。这个变化多少有点令人扼腕，毕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第一次有机会站在国际经济技术创新的前沿，与国际头部企业一起并肩前行。虽然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出现态势转弱的临时性现象，也属正常。但如果从业者、投资者普遍出现悲观情绪，对行业发展尤其是创新活动就可能造成长期性的影响。

完善平台经济治理，既必要、也急迫。但在

制定与实施治理政策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这个已经可以跟一些国际领先平台竞逐的行业，从而实现推动它们“做强做好做大”的初衷。过去在平台经济中出现了不少问题，需要想办法去规范、去纠正，但需要明确的是，大部分头部平台都是中国经济中重要的创新者、改革者、引领者。未来平台企业不但要持续地推动国内的经济创新，还要争取参与全球的经济竞争。长期看，平台经济全球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因此，中国的治理政策要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改革。

国内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该更加关注在创新与秩序之间求得平衡。首先，可以考虑放弃“强监管”的提法，虽然当前迫切需要完善治理政策，但监管应该是一项日常性的工作，不能成为运动式的任务，更要避免监管竞争。其次，可以考虑将经济监管与反垄断执法做适当的分离，前者的目的是维持有效市场的运行，而后的任务是恢复市场的有效运行。两者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但解决的问题与采取的措施有很大的差异。再次，应该考虑加强治理政策的统筹与协调，避免平台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过去一年多来，各部门竞相出手，在事实上给平台经济发展造成较大的打击，形成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称的“长期政策短期化，系统性战略碎片化”的问题。最后，要加强经济学分析在治理政策中的作用。通常参与监管政策的多为法律专家，但平台经济对许多政策问题的判定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市场份额高是否就意味着垄断，“二选一”是否就是反竞争行为，差异化定价是否一定损害消费者利益，等等。对这些现象，需要做具体、深入的经济学分析与判定，避免简单化的“一刀切”的做法。

中国远程办公的动力、特征与前景⁹

胡佳胤¹⁰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和新冠疫情防控的刚需推动，中国远程居家办公成为很多公司和员工的必选项。针对这一新的社会现象，近期，北大国发院与智联招聘就“疫情冲击下的远程居家办公：发展与展望”这一课题合作建立了课题组，由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和智联招聘集团执行副总裁李强牵头，充分利用北大国发院的研究力量与智联招聘的数据优势开展联合研究，已形成初步的“中国远程居家办公发展报告”。

动力：数字技术、疫情防控与社会压力推动工作方式革新

这里讲的远程办公，包含远程办公、居家办公、混合办公等多种模式。远程办公的出现，是数字时代工作方式革新的结果。从最初的电报、电话和传真，到互联网、宽带和个人电脑，到移动互联网、4G和智能手机，再到当下的在线办公、共享文档、在线会议、视频面试和直播软件等，科技发展促使远程办公成为对工作方式的重要革新。

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改变了经济形态和工作性质，创造出了大量具备远程办公潜力的岗位。目前，大量经济活动转移到线上进行，如在线购物、娱乐、会议、授课和

问诊等。未来，随着5G、云计算、物联网、工业机器人、AI、AR/VR等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还将有大量工作岗位可以采用远程办公方式。

新冠疫情暴发后，远程办公增强了经济体应对负面冲击时的韧性。远程办公成为封城、隔离、居家等非常时期维持工作运转的最佳选择，也是在疫情防控政策下稳增长、稳就业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远程办公作为就业工作的新形态，不仅增强了经济的韧性，帮助经济体更好地应对公共健康危机、重大灾害等负面冲击，而且降低了疫情防控政策带来的经济成本，成为全社会应对不确定性的灵活选择。当然，疫情下的远程办公，需要政府提供到位的基本保障，包括民生物资、医疗急诊、突发紧急情况救助等，以确保人们可以在家安心地开展生活和工作。

此外，远程办公也为求职者平衡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弹性空间。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房价高企、职住分离、交通拥堵等现象，让广大上班族尤其是年轻人和新市民面临买房难、租房贵、通勤时间长、家庭事业难以兼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和“生育惩罚”，让员工尤其是女性员工面临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压力。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国家“房住不炒”、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和共同富裕等顶层设计及其配套措施的贯彻实施，而远程办

9. 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与智联招聘合作组建的“疫情冲击下的远程居家办公：发展与展望”课题组成员胡佳胤在2022年4月28日北大国发院第1期“承泽论坛”上的报告整理。

10. 胡佳胤：北大国发院金融学助理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公则可以提供一个新视角、新思路，让人们在等待改革和配套措施落实的过程中拥有缓冲带。

特征：办公形式多样化 员工与企业喜忧参半

我们对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前后国内远程办公转型和招聘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从两方面观察了疫情冲击和防控政策对办公形式的改变。

1. 存量转型，即现有岗位的员工开始远程办公。存量转型的情况包括：只能线下进行的工作和活动被迫中断，能够远程处理的工作和活动转移到线上进行，电商购物和快递物流（外卖和配送）等线上线下经济的联动处于中间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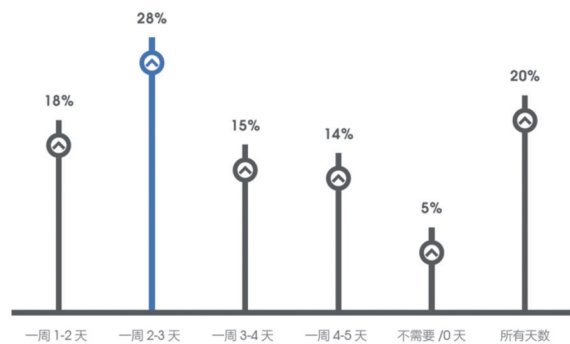
2. 增量转型，即远程办公的职位招聘数量增多。增量转型的情况包括：公司感受到远程办公的好处从而增加了相应招聘需求，线上经济大幅增长导致的新业态涌现与新职位增加，线下经济萎缩导致招聘岗位减少甚至公司生产停滞或倒闭。

针对存量转型，我们使用了来自智联用户（求职者/职场人）的调研数据。课题组设计了远程办公调查问卷并发放给智联用户（求职者/职场人）。问卷涵盖受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工作职业、通勤、居住、婚姻家庭、疫情后远程办公经历、对公司远程办公政策的了解、对远程办公优劣势的认知、对远程办公的期待等内容。问卷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在智联招聘手机客户端发布，我们最后选取了 2 月 10 日至 15 日收回的 3558 份被完整回答的问卷作为研究样本。

针对增量转型，我们使用了智联招聘大数据。依据招聘广告中包含的远程办公关键词，如远程、居家、在家办公等词汇，我们统计出 2017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智联发布的远程办公招聘广告共有 60 万条，然后从智联全量招聘广告中随机抽取了约 2000 万条（包括远程办公和非远程办公职位）与之对比。

我们发现受访者对远程办公的呼声很高，尤其是在疫情后。调查结果表明，求职者在疫情后普遍更关注远程居家办公的招聘广告，更倾向找可以远程居家办公的职位，在职者更希望自己所在公司允许员工远程居家办公。即便不考虑疫情因素，95% 的受访者希望一周中至少有一天可以远程居家办公；28% 的受访者希望一周中有两到三天可以远程居家办公，这与携程公司目前实行的“3+2”混合办公模式非常接近。（图 1）

不考虑疫情影响，您希望一周中可以远程居家办公的天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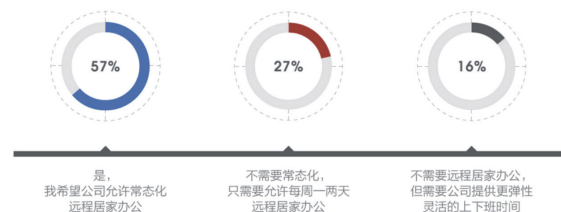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课题组远程居家办公调查问卷

图 1：受访者希望一周中可以远程办公的天数

调查显示，近六成在职者希望自己所在的公司允许员工常态化远程办公，其余在职者希望公司允许员工每周可以一两天远程办公或者为员工提供更弹性灵活的上下班时间。（图 2）

不考虑疫情影响，您是否希望您所在的公司允许员工常态化远程居家办公？



数据来源：课题组远程居家办公调查问卷

图 2：受访者对远程办公常态化的需求

实际上，疫情后国外公布的许多调查结果也显示了上述类似情况。2021年3月，微软发布的Work Trend Index报告显示，70%以上的在职者希望公司继续为其提供远程办公的工作方式选项。此外，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54%的求职者只考虑那些可以远程办公的职位。

受访者对远程办公的呼声很高，那么作为职位的提供者——公司对远程办公的看法又如何？从公司层面来看，采用远程办公工作模式的最大顾虑在于是否会因此降低员工的工作效率，并增加公司管理的难度。但现有研究结果表明，远程居家办公不但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还降低了员工流失率，促使员工为公司创造更多价值。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斯坦福大学和携程公司合作进行的远程办公实验。实验发现，远程居家办公的携程公司呼叫中心员工，其工作效率较远程居家办公之前不降反升，其离职率也降低了。此外，远程居家办公还为公司节省了写字楼租金、办公设备购置等运营成本。

上述研究结果证明，远程办公是一种可以让公司和员工实现双赢的工作模式。那么，在实际生产活动中，为什么真正实行远程办公的公司却很少呢？这反映出远程办公的局限性和现实阻力。

首先，因为工作内容和性质的原因，经济活动中的大量行业无法进行数字化转型，其生产经营必须在线下进行，比如农林牧渔业、制造业、运输业以及建筑施工、医疗手术和家政等行业。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测算发现，仅仅因为工作内容和性质的原因，美国就有63%的工作岗位无法远程居家办公。

相比之下，互联网、金融、教育相关行业更容易转为远程办公。在我们的原始数据中，教育培训的远程办公职位招聘数量占智联远程办公职位招聘总数的三分之一，但2021年7月“双减”政策出台后，教培行业的职位招聘数量呈“高台跳水”式下滑。为保证后续分析的连续性，我们

在研究中排除了教培行业在远程办公职位中的数据。在排除占比最大的教培行业后，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发布了四成以上的远程居家办公职位招聘。（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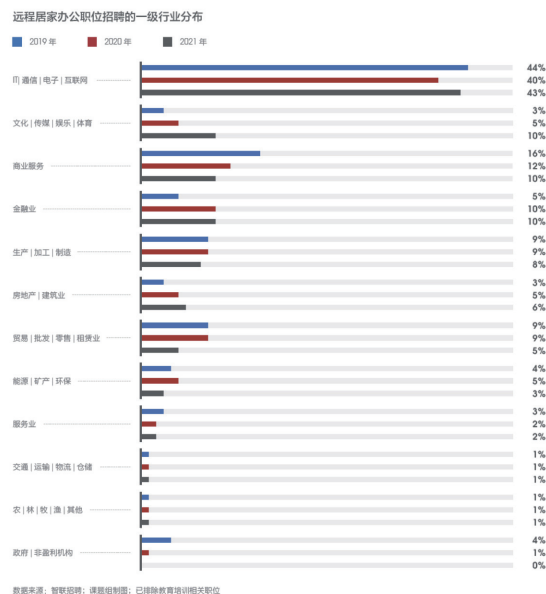


图3

其次，在那些适合远程办公的行业里，也有多重因素阻碍了其远程办公的推行与普及。具体原因包括：

1. 信息不对称，企业管理层不经过尝试就无法了解远程居家办公的实际好处，因此难以对远程办公进行准确的成本收益评估；
2. 转型成本高，远程办公颠覆了传统组织架构，公司管理层和团队领导无法现场实时了解和指导远程办公员工的工作，员工也需要时间适应新的工作模式；
3. “不患寡而患不均”，如何制定远程办公工作模式下的工作制度、考核标准和薪酬机制等，需要高层通盘考虑。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客观上推动了远程居家办公的转型。疫情冲击下，远程办公职位发

布数量大幅增加，至 2021 年底仍维持在疫情前的三倍水平。调查显示，疫情前，只有 8% 的在职者所在的公司允许员工远程办公，18% 的在职者不了解公司的远程办公政策，只有 15% 的求职者有过远程办公经历。疫情后，31% 的在职者所在的公司开始实行远程办公，35% 的求职者有过远程办公经历，但也有 43% 的在职者所在公司在疫情前后都不允许员工远程办公，还有 50% 的受访者仍然没有经历过远程办公。

从招聘市场的整体规模来看，远程居家办公的职位招聘广告在智联全量招聘广告中占比非常小，但其在疫情期间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图 4）



图 4

疫情后，大量公司迈出了远程办公的第一步，

开始了远程办公的职位招聘。数据表明，疫情后远程居家办公职位招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由疫情前从未发布过相关职位的公司带来的。一方面，疫情防控政策下公司不得不将部分职位转为远程居家办公，有可能在体验到远程居家办公的好处后持续地发布相关职位招聘需求；另一方面，疫情期间线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消费者强化了对线上业务的需求。有些无法适应这一转变的公司会因为生产活动难以为继而在疫情中暂停营业甚至倒闭，也有一些新的公司会在疫情冲击造成的行业环境的变化中应运而生，从而创造出更多可以远程居家办公的职位。（图 5）

八到九成招聘远程居家办公职位的公司都是疫情后新开始此类招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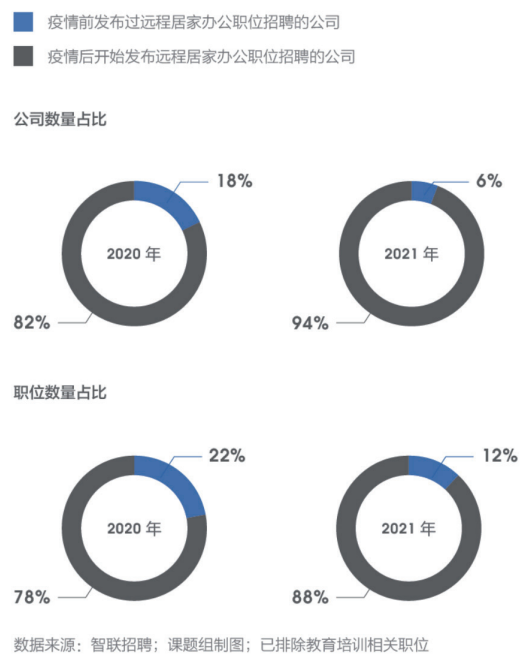


图 5

同时，不同经济活动和职业的远程办公可行性存在较大差异。远程办公的招聘职位多为单体化（如在线客服、在线销售、视频主播）、知识型（如在线教育、专业服务咨询、设计制图、翻译）、互联网（如程序员、工程师、网页开发）等岗位，而农林牧渔业、大部分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服务业的一线业务岗位(如建筑装修、设备维护、家政保洁)等则不具备远程办公的基础。此外,还有一些岗位是线下(仓储、物流、配送)与线上(如电商、餐饮外卖、酒旅)的互补,存在线上线下上的联动性。

从长期来看,疫情冲击催化了远程办公的存量和增量转型,未来的用工需求和就业形态还将受到持续影响。

前景:社会效益明显 深入发展势在必行

如果远程办公是未来发展趋势,那么除了讨论其对员工工作效率的影响外,还应关注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

调查发现,远程办公的突出优势表现为,60%的受访者认为,工作时间更加弹性灵活,比如可以自行分配工作和休息时间;59%的受访者认为,节约了上班通勤成本;46%的受访者认为,方便照顾家庭,比如照顾小孩、老人或者不用与家人两地分居。

关于远程办公的这些优势,国际学界也有相似发现。

与此同时,远程办公也面临一些挑战。调查发现,“家里缺少安静的办公环境(比如与子女/老人/室友同住)、缺少电脑等远程办公设备和宽敞的办公空间”等劣势,并不是求职者最在意的,而“公司付给远程办公员工的工资更低、工作与生活缺乏界限(比如夜晚的工作电话)、工作效率低从而影响团队合作、缺少与同事的社

交互互动”等相对软性的因素,才是求职者所认为的远程办公的最大劣势。

我们的研究发现,影响人们远程办公意愿的因素包括:

1. 通勤因素。通勤时间越长,求职者远程居家办公意愿越强;

2. 住房因素。大城市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高住房成本带来沉重负担,因此租房成本越高,求职者远程居家办公意愿越强;

3. 婚姻、家庭和性别等因素,求职者越希望平衡工作和生活,远程居家办公的意愿越强。

因此,远程办公或可成为缓解上班族通勤、住房、兼顾家庭等社会问题的方式之一。从大家疫情期间的远程办公经历来看,相较于常规上下班(坐班制),近六成员工对远程办公的体验更满意,当然也有四成员工认为各有利弊,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在实践中进行调整。

从国内外远程办公的企业实践来看,在国外,亚马逊、微软、谷歌和苹果等互联网公司推出了混合办公模式,将远程居家办公的选项变成了常态化机制;在国内,携程公司于今年3月正式宣布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远程居家办公,成为了国内首家推出“3+2”混合办公制度的大公司,为其他有类似条件的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示范。

当前,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催生了一大批新就业形态,促使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变革,这些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当代中国青年的使命与机遇¹¹

林毅夫¹²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一方面是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是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国内外肆虐。今天我想谈一谈，这样的时代对在座的各位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应该如何来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我想，这些也是许多青年朋友正在思考的问题。

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是我们中国青年人的优秀历史传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一个具有世界鼎盛文明的国家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国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我是鸦片战争以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六代知识分子，今天在座的青年朋友们是第七代知识分子。

七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推动了洋务运动。受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屈辱，为了民

族的复兴，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发起了洋务运动。他们认为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保留，同时加强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等先进技术，主张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

第二代知识分子进行了维新变法和共和革命。洋务运动后，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这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远远不够，还应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同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日本，其明治维新比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晚了好几年，但日本因为进行了制度变革而率先迈入现代化，并且很快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因此，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提倡制度改良，推行君主立宪制，希望通过对体制变法让中国由弱转强。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另一批知识份子，认为中国仅仅实行君主立宪制还不够，还应当以美国为榜样，实行更先进的共和宪政，建立民主共和国。

第三代知识分子发起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

11. 本文根据林毅夫在2022年4月23日北大国发院第四届“国家发展青年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12. 林毅夫：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并成为战胜国，最后却受到战败国的待遇。中国原本以为战后可以收回之前丧失的各种权利，特别是要从战败国德国手上收回青岛的租界，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第三代知识分子认为仅有西方先进的枪炮和制度也不行，中国人还需要具有现代化的精神，于是他们推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

中国的第四代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以后入学，毕业后献身于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一代。第五代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入学，毕业后参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六代知识分子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入学，毕业后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30年为一代，2008年以来进入大学的青年一代就是第七代知识分子。

第七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

今天来参加国家发展青年论坛的朋友们，你们就属于鸦片战争后的第七代知识分子。和前面的六代相比，我认为你们是最幸运的一代。

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总量的1/3。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急剧下滑，1949年时的GDP只占全世界总量的4.2%。国家越来越穷困，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也就越来越低，前四代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复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然而始终面对的是国势日衰的悲惨命运。

相比前四代知识分子，第五代相对幸运。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五代知识分子赶上了和平年代，开始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他们在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上世纪60年代成功试爆了原子弹，70年代将人造卫星送上天，

为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国防基础，让中国有独立自主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条件。只是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和综合国力上还是积贫积弱，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的占比仅为4.9%，只比1949年提高0.7个百分点；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三，比公认的世界最贫穷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人均GDP的1/3还低。当时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这是第五代知识分子身处的时代。

相比前五代，我们第六代知识分子是更幸运的一代。改革开放后，中国连续40多年保持年均9%的经济增速，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过去40多年，中国有8亿多人摆脱贫困，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毫无疑问，当下是中国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因此，我们作为第六代知识分子是幸运的。

但是和你们相比，我们成长的年代还是物资匮乏的年代，过的是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我们成长的年代还是仰视发达国家的年代，很多国家的发达程度让我们觉得高不可攀。

相比于前六代，你们作为第七代知识分子是最幸运的一代。你们出生于90后、00后，成长于欣欣向荣的和平年代，可谓是“含着金钥匙”长大。在你们毕业之前，将见证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一历史时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GDP12,695美元，中国2021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550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标准只差1.8个百分点。我们只要努力一下，快则今年、明年，慢则后年，中国一定可以迈过这道门槛。

迈过这道门槛，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目前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只占世



界总人口的 16%，当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后，这一数字将由 16% 变成 34%，即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将比现在增加一倍多。

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后，正年富力强的时候，将在 2049 年迎来建国 100 周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当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会是什么样的发展状况？我想，届时中国的人均 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应该会达到美国的一半，相当于韩国在 2002 年时相比美国的水平。当我们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一半时，由于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所以我们的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的两倍。在我国比较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与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共有 4 亿多人口，与美国人口数量相当，这些地区的人均 GDP 与美国将处在同一水平，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平均产业技术与美国也达到同一水平。美国是世界上先进国家的代表，当我国这些地区与美国的经济体量、科技水平和产业水平相当时，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与美国一样发达的地区。当然，到那时国内不同地区还存在差距。我国中西部地区还有 10 亿人口，还有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的空间，有机会使经济取得比美国更快速增长。

这是你们第七代知识分子身处的大时代。

第七代知识分子的机遇

这样的大时代对在座的各位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学经济的，我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1995 年，《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时邀请了全国十多位经济学家发表祝贺文章。非常荣幸，我也是受邀人之一。我当时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这篇祝贺文章中做了一个论断：我国的经济学人只

要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21 世纪的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21 世纪将会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当我提出上述论断时，很多人表示质疑。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发院的前身）才刚刚创办一年，国内受过完整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年轻一代经济学人主要就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六位创始老师，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而且，在全世界有影响力的华裔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位。

我提出上述论断，主要源于对经济学理论本质的认识。回顾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从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开始，经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现在，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在这两段时期，其它国家的经济学大师凤毛麟角。

为何经济学大师产生的国家会有上述的时空相对集中性？这是由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和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一样，经济学的每个理论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逻辑。理论的重要性不是取决于理论的逻辑本身，而是取决于该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何谓重要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就是发生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的经济现象或问题。解释那个现象或解决那个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最重要的理论，提出那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大师。

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 1776 年，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它是当时欧洲最大、最发达的国家，并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英国那时出现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就是对世界影响最大、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或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至美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发生在美国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或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在学校读书时，当时国际上常用一个比喻——“只要美国的经济打喷嚏，其它国家的经济就要患重感冒”。由于在从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找出背后的决定因素以构建其因果逻辑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绝大多数世界级经济学大师也就出现在位居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

对于你们第七代知识分子而言，当你们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时，正是中国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时。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的两倍、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五倍或是印度的四倍以上。届时，中国就是世界经济中心。中国发生的经济现象或问题自然就是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现象或问题。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或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上，中国经济学人同样“近水楼台先得月”，将有许许多多机会引领国际经济学理论的新思潮。

这是大时代赋予你们的机遇。

第七代知识分子如何抓住机遇，不负使命？

抓住时代机遇，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要改变当下学习和做研究的方式。

我当学生时，抱着向西天取经的心态去学习，相信你们现在也还是这样。中国知识分子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祖国追赶上发达国家，于是我们去学习和研究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道理，并希望利用那些道理来改变祖国的现状。

作为学生，我们学习了最前沿的理论并努力记住那些知识点，这是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普遍使用的学习方式。作为经济学人，我们拿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或是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发达国家的理论，这是

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人习惯用的研究方式。

我们学习和研究理论的目的是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我们惯用的学习和研究方式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发表论文，但它能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吗？

当下，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900年攻打北京的“八国联军”是当时世界的八个列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奥匈帝国。当时这八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的50.4%。到2000年，组成“八国集团”的最发达工业化国家变成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加拿大，之前的奥匈帝国在一战后解体成奥地利和匈牙利退出了列强的行列，其地位被加拿大所取代。此时“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47%。可见，世界上最强大的八个工业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在整个20世纪基本未变，由于经济的强盛，它们一直都在主宰世界。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时“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4.7%，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它们失去了主导世界的的能力，世界格局由此发生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过去应对这样的危机只需八国领导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现在则需要“20国集团”领导人共同决定。

整个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为民族复兴而努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然而到21世纪初期，“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仅仅从50.4%下降到47%，这意味着世界上其余国家虽然很努力，但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仅仅增加了3.4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如果把人口算进来，发展中



国家的人均 GDP 相对发达国家是下降的。发展中国家的历代知识分子为实现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虔诚地向西天取经，但结果不但没有赶上发达国家，而且与发达国家在人均 GDP 上的差距不断扩大。

在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尽管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讲得头头是道，但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去实践能够获得成功。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地、长期地陷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能够摆脱这些陷阱的国家非常少。少数几个摆脱这些陷阱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这些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在发展中推行的政策，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

任何理论作为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必然由理论提出者经过抽象和舍象两个过程来构建。理论提出者从其所处国家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找出关键性的变量，并保留在理论中作为因变量，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或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同时舍象其它非关键性变量，即对其它非关键性变量存而不论。这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社会经济变量，就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或控制论的状态变量。而这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社会经济变量若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原来的理论就失掉了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被一个新的理论所取代。

任何理论的适用性都取决于理论的前提和暗含前提是否一致或相似，英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在发达国家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推陈出新，但当这些理论拿到中国是否还能适用？中国和英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技术和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必然存在内生差异，运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时，难免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问题，也难免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被称为世界奇

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存在的问题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然而，中国的成功和问题必然有其道理，把这些道理揭示出来就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创新。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还会有许多新的经验和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仍然需要有抓住其背后因果机制的新理论来解释和解决。

中国经济学界若能在做研究、写论文时把握住中国经济结构和扭曲的两个内生性，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经验、现象、问题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就能产生许多和现有主流理论不同的新理论、新观点。而当我们能够解释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时，这个理论就是最重要的理论。

除中国以外，那些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也应该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体量较小，所以总结它们经验的理论在国际上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中国的体量大，总结中国的经验，就如同 19、20 世纪初总结英国的经验、二战以后总结美国的经验一样，可以引领全世界的理论思潮。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从亚当·斯密到现在，一直都是世界上最权威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来自于中国的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会比发达国家的理论更具适用性。

结语

中国第七代知识分子肩负的责任重大。你们生于中国发展最好的时代，是最接近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的目标，而这一目标有赖于在你们第七代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时实现。

不过，要完成这个目标并不是没有前提条件。中国有句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做事越接近成功越困难，越要更认真地对待。我们越

是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要面对更多、更艰巨的挑战，尤其是当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来自我国的、能够揭示其因果机制的理论的指引。

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七代知识分子中的经济学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有赖于你们根据中国的实际经验、现象和问题而提出的理论创

新来指引，这样的理论也能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引领世界经济学的理论思潮。这是时代赋予你们的使命和机遇，这样的理论创新还可以帮助占世界人口 60% 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实现和我们共同的追赶发达国家的梦想。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会在你们第七代知识分子年富力强的年代实现。



本轮全球通胀的疫情与非疫情成因相互交织， 结构性和货币性特征更为彰显¹³

卢锋¹⁴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

最近这轮美国和全球通胀呈现出超越传统通胀的内涵特点，构成当代全球经济格局大变革的新动向，成为疫情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现实研究课题。结合人大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报告主题内容，我主要谈两点问题：一是如何厘清疫情与非疫情因素作为通胀成因的作用机制与相互关系，二是从结构性与货币性两方面观察这轮通胀的表现特征。

首先看能否把目前国际范围通胀现象称作全球通胀？去年全球平均消费物价涨幅达到4.3%，在过去15年中居于第三高水平。美国 and 主要发达国家更是遭遇几十年未遇通胀，由于美国是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其严重通胀必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显著溢出效应。基于上述情况，这里采用全球性通胀说法，并侧重以美国作为国别对象考察。

1、全球通胀的疫情与非疫情成因

过去两年新通胀发生的基本环境特征，是全球经济遭遇百年未有的疫情冲击。新冠疫情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后世界范围最严重公共卫生危机，标志人类疾病史的一个划时代变化，提

供了疫情经济学包括疫情宏观经济分析新领域兴起的契机，构成去年全球性通胀的基本背景。

早先教科书讨论的通胀，往往是假定供给端潜在产能得到实现背景下总需求过度增长导致的通胀。这次通胀也与供不应求失衡相联系，特点在于疫情与非疫情因素作用使得宏观经济面临人大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报告强调的供求双冲击。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宏观经济造成直接和间接影响，是决定去年美国和全球通胀的基本变量，因而需借助疫情经济学视角厘清疫情影响的具体机制。另外，新冠疫情冲击与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趋势性演变同时发生，逆全球化、绿色和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等结构性因素也对供求关系与通胀现象产生了不同程度影响。

首先看疫情冲击的直接影响。防控疫情需不同程度借助非药物干预手段，通过个人选择或政府管制采取各种各样社交距离措施，以减少病原体人际传播带来的感染，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疫情初期这类社交距离管控和非药物干预尤其重要。社交距离措施通过交易成本变化直接对经济供求两端及其子部门产生不同方向影响。最早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对供给需求活动的抑制作用，如客运停摆、餐馆停业、娱乐设施关门、甚至学

13. 本文根据卢锋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第一季度）（总第60期）上的演讲整理。

14. 卢锋：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目前担任财政部、人社部顾问和国际组织AMRO咨询组专家成员。

校停课等。越是需要密切接触的经济活动这类影响越大，大流行初期更严重。然而与宏观经济早先其它类型冲击不同，疫情影响也表现为对某些经济活动的提振作用，如无需人际接触的网络购买线上消费快速提升，网络直销、视频主播、线上培训等供给活动超常增长。

间接影响是指应对疫情冲击实施的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疫情刺激政策内生于疫情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导致其不同于一般逆周期宏观调控特点。针对疫情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各类救助和刺激措施提振总需求，大量直达居民个人的补贴救助是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疫情刺激政策特点之一。与通常逆周期宏观政策另一点差异是同时对供给端发力，如信贷支持和补贴政策措施，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都对企业复工复产和供给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方面一个较为特殊现象，是美国由于对个人直接救济补贴力度较大和持续较长，增加了人们重回工作岗位的机会成本，劳动供给意愿下降对供给复苏带来边际抑制作用，并对通胀产生影响。

非疫情因素也影响到供求关系与通胀，这在去年石油供给复苏乏力和价格飙升上表现得比较明显。疫情冲击初期，石油需求大幅收缩，不久疫情相对稳定和经济开始复苏后，需求开始快速回升，然而在气变治理与能源转型大背景下，疫情前行业投资多年下降导致新增产能相对不足，加上 OPEC 不愿充分释放现有产能的策略性行动，导致石油产量复苏滞后并伴随供不应求缺口，成为推动通胀的供给侧重要因素。展望未来，即便新冠疫情危机成为过去，能源转型背景下绿色溢价导致的成本推进通胀效应仍有望持续发挥作用。最近俄乌战争提示的地缘政治紧张与风险上升，会加剧上述结构性趋势的影响。

另外还需关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影响。当代全球产业链重组涵盖两类变动。一是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适应比较优势规律作用转移到周边低成本国家甚至非洲国家，这种供应链调整主要由比较成本动机和市场竞争机制推动，本质上是经

济全球化趋势的延伸拓展，类似于早前境外制造业依据产品内分工原理向我国转移，这类重构有利于降成本和抑制国际性通胀。另一类是美欧等国基于战略和安全考量谋求再工业化，这类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战略产业政策代表了逆全球化动态，具有拉高成本因而具有助推通胀效应。具体观察近年实际情况，后一类产业链重构可能也对现实通胀产生了推波助澜作用，不过相对影响较为有限，这类政策未来是否会大规模实施并派生更大通胀压力值得关注。

2、疫情期通缩与通胀演变的阶段性

上面提到疫情对供给和需求冲击效果具有不对称性，在有些场合是抑制性的，另外场合则可能有提振性，对宏观层面供求关系和通胀形势总影响取决于诸多不同作用净效果，因而其物价总影响既可能是通胀性的也可能具有通缩性。逻辑上疫情冲击会影响供求和通胀，但是无法事先确定上述净效果的方向和大小，无法确定现实是通胀还是通缩，而是需结合疫情发展、经济复苏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实际情况具体观察。

观察美国有关情况，过去两年多疫情、经济及通胀形势大体经历三阶段。一是疫情最初冲击阶段，物价下降伴随通缩压力。社会最初处于高度恐慌和失控边缘状态，大量经济物品供求不平衡伴随需求收缩超过供给下降的特征，表现为经济收缩背景下一般物价下跌与通缩风险上升。一度出现石油负价格、股票十天四熔断等短期市场极度看空的恐慌现象，核心 CPI 同比增速从 2020 年 1 月 2.3% 大幅跌至 5 月 0.2%。可见这个阶段疫情对经济不仅产生巨大收缩作用，而且对需求打击超过供给冲击从而导致通缩效果。对疫情前期通缩性的先入为主印象，可能对美联储后来研判通胀形势偏差产生了某种微妙影响。

二是最初冲击波过后到疫苗接种前，对美欧等国大体对应 2020 年 5 月到年底，特点是通胀



触底后进入温和回升阶段。大流行最初恐慌冲击大约持续 2-3 个月，社会紧急动员应对使剧烈动荡形势初步稳定。从口罩、呼吸机到急救室的医疗设备和能力的极为紧缺和挤兑现象得到缓解并趋于消退，医治经验积累和手段增加使死亡率显著下降，消费者支出回升与企业陆续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复苏，社会开始转向初步常态化。另一方面，高效疫苗还在研发之中，人们对感染风险和新变种流行仍心存恐惧，不同范围和场合保留延续社交距离措施，经济复苏仍受到显著制约拖累。这个阶段诸多行业仍未摆脱衰退型供大于求格局，美国核心 CPI 同比增速从 2020 年 5 月 0.2% 回升到 12 月 1.3%，仍低于长期平均水平。

第三阶段是疫苗大规模接种推动逐步向常态化过渡阶段，在美欧等主要西方国家大体是 2021 年以后，疫情直接影响进一步弱化但是追加刺激政策使得间接影响有增无减，叠加其它非疫情因素推动通胀快速飙升。疫苗大规模接种使公众恢复常态化生活信心增加，早先被抑制消费需求释放加上拜登政府追加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法案，推动消费需求强劲增长。供给方面产能利用率上升伴随产量增长，库存减少与预期改善推动固定投资提速，供求正向互动促成宏观经济 V 型复苏。不过疫情牵制作用仍广泛存在，尤其在供给端表现得更为突出，如餐饮娱乐等劳动密集行业劳动力供给持续不足，石油、汽车和部分家电受制于芯片短缺与其它瓶颈制约供不应求，物价飙升与通胀压力持续增加倒逼宏观政策转向。

3、疫情期通胀的结构特点更加彰显

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经济学常识，意味着某种形式货币超发与通胀现象具有不解之缘，广义货币成因是通胀的普遍规定。然而观察中外大量实际通胀现象，每次通胀在发生条件、背景环境以及物价表现的内部构成方面都具有不同特点，甚至可以说没有两次通胀完全相同，因而任何通胀都是货币性和结构性的统一。这次通胀在结构

性与货币性方面有哪些特点？

最重要的结构特点是与疫情冲击主因相联系的特征表现。上面提到疫情冲击下不同经济活动受冲击方向和程度与各自社交距离直接相关：实现经济活动要求社交距离越短部门受冲击越大，反过来可以网络为手段实现的供给需求活动如网络购物和便餐外卖因祸得福逆势繁荣，社交距离成为影响行业景气度的关键参数。微观主体与行业部门复杂的涨落枯荣组合效应，汇聚到宏观经济层面塑造整体通胀形势，提供宏观经济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通胀观察样本。

其次是商品价格涨幅大幅超过服务价格。与经济全球化拓展深化相联系，美国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三次通胀（1980、1990、2008），商品价格都低于服务价格。经济全球化借助产品内分工、外包、加工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等系统机制作用，推动可贸易部门产出品成本和价格下降，由于制造业可贸易性程度显著高于服务业，国际货物贸易较快增长不仅对发达国家带来抑制通胀效果，也影响到通胀阶段商品价格超过服务的结构特征。去年相关形势出现逆转。疫情后人们居家隔离和工作时间增加推动商品配套需求提升，另外个人交通工具轿车需求也超常增长，然而商品供给以及包括集装箱在内物流环节受疫情冲击出现瓶颈，导致汽车、能源、电子产品等商品价格不同程度上升。受这些因素影响，去年美国商品价格涨幅 10.7%，比服务价增长 3.7% 高出近 1.9 倍。

另外疫情助推汽车需求增长背景下，汽车用半导体芯片受疫情冲击供给受挫导致供不应求价格飙升。当代汽车产业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大量采用半导体芯片作为关键零部件，一辆车或平均耗用 500-1500 块芯片，使得汽车从传统机械电力装置变成“半导体富集设备”。然而半导体芯片作为高度全球化行业，去年马来西亚麻坡（Muar）芯片集聚区受疫情严重冲击等因素，拖累全球芯片供给能力重创下游汽车供应链，以至于 2021 年被马斯克称作“（车用芯片）供应链

超级疯狂紧缺年”。2021年全球汽车产量预计不到8500万辆，显著低于2019年9200万辆，但是汽车价格上升和消费者提货时间拉长，芯片短缺成为重要拖累因素之一。另外上述非疫情因素抑制供给作用助推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也赋予这次通胀以新的结构性表现。

4、疫情期通胀的货币性特点更有特色

当代不兑换纸币制度下，货币超发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宏观政策的产物，从货币与宏观政策提供满足通胀实现条件的具体方式看，本轮美国通胀特点同样极为突出。

首先从美联储货币扩张触发机制看，疫情大流行冲击打响发令枪。疫情前夕美国货币政策处在向新一轮宽松的准备和过渡期。2019年7月美联储结束缩表并降息25个基点开启新一轮降息周期，同年9月中旬“钱荒”事件促成再次降息25个基点到1.75-2.00%，不过美联储当时仍希望在完成金融危机长周期后保持一段时期政策中性状态，避免马上进入新一轮量化宽松。但是疫情冲击改变了美联储货币政策时间表：2020年1月21日美国官方确认首例新冠病例，2月29日报道首位死亡病例，3月2日美联储临时召开视频会把基准利率调减50个基点到1-1.25%。进入3月后疫情大流行对美国金融和经济造成猛烈冲击，3月9日美国股市惊现此后十天四次熔断的第一次熔断，3月13日白宫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倒逼3月15日美联储货政例会决定将货币政策转换到全面应对危机模式。

其次是美联储更大规模“量宽2.0”政策提供支持本轮通胀的基础货币扩张条件。2020年3月中旬美联储迅速将基准利率降到接近零值，并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实现了远超应对金融危机时的基础货币扩张。美联储持有债券从2020年初约3.8万亿美元扩大到2022年元月底8.3万亿美元，2022年元月底比2017年上轮量宽4.26

万亿峰值高出94.8%。国债规模从2020年2月底2.5万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2月中旬5.74万亿，最近规模比上轮量宽时2017年2.47万亿美元峰值高出1.21倍。MBS和其它机构债从1.37万亿增长到2.71万亿，目前比上轮量宽在2017年达到的1.79万亿美元高出51.4%。同期美联储资产规模从4.2万亿增加到8.9万亿，比上轮量宽时该指标2017年4.48万亿美元峰值高出98.7%。

再次是与后金融危机时不同，近年美国广义货币与基础货币出现同步扩张。应对金融危机时，美国量宽刺激带来的大规模基础货币扩张，由于多方面原因并未传导为类似量级的广义货币扩张：美国后金融危机时期年度M2同比增速高点在2011年达到6.7%，远低于上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14%峰值，也低于金融危机前2007年11.7%。然而近年美联储大规模量宽刺激后，基础货币扩张毫无悬念地转换为广义货币创纪录飙升，美国2020年和2021年竟分别飙升到19%和16.8%，超过70年代初美国所谓“通胀黑暗时代”的广义货币增速。基础货币向广义货币顺畅传导，意味着本轮货币放水会直接导致更大通胀压力。

最后一点特征是美联储货币放水与财政政策超限扩张共同发力，一定意义上形成“没有现代货币理论MMT名义的MMT政策实践”。新冠危机20年3月全面暴发，特朗普不到一年推出五个财政法案应对，总规模近3.8万亿美元，其中“CARES（新冠援助、救助与经济安全法案）”2.2万亿。拜登在2021年3月底签署1.85万亿美元“美国救助计划（ARP）”法案，至此美国疫情财政刺激规模已达5.65万亿美元，是2019年GDP的26.4%，远超金融危机财政刺激GDP占比5%-8%。疫情期美国财政刺激自觉性和偏好大提升，背后有多方面历史、现实与理论根源，对此我们在“透视美国财政决策新思维”、“通胀之约——美国新通胀怎样炼成”中做了梳理，这里限于时间不展开讨论。



5、小结

本文主要讨论了两点：一是在解释现已发生的美国与全球新通胀诸多成因中，疫情冲击发挥了主因作用，非疫情因素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理解疫情与新通胀关系，需同时考虑疫情对经济直接作用以及疫情推动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间接影响。

二是从通胀结构性和货币性相统一角度看，疫情期新通胀在产生原因、结构表现等方面的结构性特点都更加彰显。另外与新世纪以来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演变大势相一致，同时受到疫情大流行危机冲击影响，美国新通胀的货币支持条件也表现出鲜明而深刻的特色。总之，观察研究新通胀，或需适当利用疫情经济学与量宽经济学的新视角。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看今年的经济形势¹⁵

姚洋¹⁶

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和大家分享两会后的经济形势。一般来说，每年两会都是按照头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来安排工作节奏。今天的内容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政府工作报告新看点、挑战和举措三方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关注中央文件很长时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央在正式文件里表达对经济形势比较悲观的看法。具体而言，需求收缩，指的是从去年年中以来我国需求一路下滑，压力非常大；供给冲击，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电力、煤炭供应紧张，原材料价格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猛涨，PPI涨8%，而CPI涨幅还不到1%，企业压力非常大；预期转弱，由于预期和前面两点紧密联系，当然大家不愿意投资。这一判断给今年的经济工作定了一个调——“稳增长”排在第一位。这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2、关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现在强调的是，首先要

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这里明确了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给我们的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在这里强调一点，大家在理解中央政策时，一定要阅读中央文件原文，而且只需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不要去做过分解读。

3、对外部环境的判断

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中央对国际形势判断比较悲观或者说比较谨慎，而今年又出现了俄乌冲突，外部环境就变得更加复杂。

4、关于民营经济

中央文件里说得很清楚，“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体来看，“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就是资本不要越界，尤其是不要干预政治和意识形态，正常的经营发展没有限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指的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既要搞公有经济也要搞民营经济，不存在“只支持公有经济，不支持民营经济”的说法。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民营企业不用担心。关于民营经济，也要按中央文件的字面意思去理解，不要去做过分解读。

15. 本文根据姚洋在2022年4月15日北大国发院第62期EMBA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16.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40人论坛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政府工作报告新看点

1、较高的 GDP 增长目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定了一个比较高的 GDP 增长目标——5.5%。为什么要定这么高的目标呢？首先，是要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今年“稳增长”的决心。把目标定高一些，说明政府“稳增长”的力度会比较大。第二，是为了提振士气。从去年年中开始，大家的情绪都比较悲观，因此通过定一个比较高的目标给市场传递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第三，5.5% 的增长率和我国的潜在增长率相符。潜在增长率是由供给侧决定的增长速度，是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决定的增长速度。我个人测算出的潜在增长率在 4.68%–6.25% 之间，平均值超过 5.5%。过去两年我们平均的增长速度为 5.2%，并没有达到潜在的增长速度，所以今年定下的 5.5% 也不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这个目标能不能达到呢？我觉得挑战还是很大的，主要困难出在消费上。

2、“双碳”政策调整

“双碳”政策调整的力度非常大。过去几年我们是“运动式”减排，最后导致了很大问题。今年总理在工作报告里将“双碳”和经济增长目标连在一起讲，说明把“双碳”提到了很高的位置。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留有适当的弹性，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的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这意味着，“双碳”计划按照“十四五”规划所定的步骤实施即可，而且还留有适当的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代表团的讲话更直接。他讲了一个笑话，说过去重庆有一个挑夫买彩票中了彩，结果一高兴把自己的扁担和箩筐扔进了嘉陵江，但没想到那张彩票还在箩筐里，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总书记说，“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国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不能把手里吃

饭的家伙先扔了……既要有一个绿色清洁的环境，也要保证我们的生产生活正常进行。”总书记在内蒙古代表团的讲话有深意，因为内蒙古是产煤大省，是煤矿工业的大区。

我们北大国发院每年要做一份智库报告，今年的报告是《中国如何应对“双碳”》。所谓“碳达峰”，即减排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一致。比如经济增速是 5.5%，减排速度每年也要 5.5%，二者要能对冲掉。“碳达峰”并不意味着不再有碳排放，而是最终由经济增长的那一部分将减排带来的经济损失冲销掉。

为此，我们对 2030 年能不能实现“碳达峰”做了粗算。实现“碳达峰”，主要靠降低煤炭比例，包括两方面措施：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

“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能源效率计划每年提高 3%。这一速度并不高，过去 20 年我们基本上每年的能源效率也能提高 3%。另一方面是改变能源结构。目前，煤炭占全部能源消耗的 60%，全部排放的 80%。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中国计划煤炭占全部能源消耗的比例在“十四五”期间降低 10 个百分点，“十五五”期间再降低 12.5 个百分点，由此可带来每年 1.64 个百分点减排。两方面的力量合起来，能源效率提高和降煤能带来 4.64% 的排放下降，而我们的经济增速也往下走，估计到 2030 年降到 4.8%–5% 之间，因此减排速度和经济增速能基本保持一致。

同时，中国碳排放的技术也还有改善的空间。要完成 2030 年“碳达峰”目标，还需要排放技术每年提高 0.86%。比如火电厂虽然烧煤量不变，但排放技术的改善能使碳排放率下降。

综上，我们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只需沿着已经规划好的减排路线走即可，不必再追加“运动式”减排，这也是我们北大国发院智库报告的主要基调。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双碳政策调整的政策含义是什么？

首先，“运动式”减排将停止，不会再关停

更多煤矿。

其次，煤炭清洁技术可能重启。原本我们对煤制气、煤制油等技术已经投入很大研发，但中途因为减排停工，今后估计会重启一部分。习总书记去内蒙古代表团讲话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内蒙古有很多这样的技术企业。

最后，新能源电动车将有更大发展。目前，我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发展已经全球领先。如果说中国的产业政策有成功案例的话，电动汽车产业应该算一个。我国从2001年开始发展电动汽车，其销量在2020年占世界的30%-40%，而燃油车销量只占世界的10%。2021年，我国电动汽车的销量是354.5万辆，全球占比近60%，是美国的6倍。除销量外，我国电动汽车的技术也全球领先。我国69%的新能源车型搭载了三元锂电池。蔚来、小鹏的领先型汽车续航已达到700公里，并且成本更低，尤其是比欧洲车的成本更低。到2030年，我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可望达到1400万辆，届时将超过全球总销量的三分之一。

这带动了造车新势力的崛起。2021年相比2020年，小鹏、理想汽车的交付量都出现无与伦比的增长，今年一季度继续呈现爆发式增长。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蔚来汽车因为市场占有率已经较大，所以销量增长较慢一点，其它几家销量增长都超过100%，其中在北方比较少见的零跑、哪吒汽车分别出现3-4倍以上的增长。

电动汽车的利润也在提高。理想汽车2021年仅亏损3亿，四季度实现盈利。美国特斯拉能够盈利是因为有联邦政府补贴。每卖一辆特斯拉，美国联邦政府给特斯拉补贴2000美元。理想的销量今年也增长良好，今年极有可能实现全年盈利，而且理想的车价还在涨，最高档车型售价超过45万，蔚来的平均售价为42万，都超过特斯拉。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高档车领域占比较大，中国人开始购买国产高档汽车。

在全球电动车市场，特斯拉的份额第一，比亚迪第二，而目前特斯拉的份额在下降，比亚迪在上升。有预测认为比亚迪超越特斯拉指日可待，因为比亚迪的车型从低档到高档一应俱全，目前中国主要的电动汽车出口还以中低档为主。十年之内，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的发展极有可能重复日本汽车当年的辉煌。

3、房地产政策松绑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主力之一。有数据显示，房地产对我国GDP的贡献率为17.2%，非常高，而且间接贡献更大。房地产行业不仅仅是盖楼、卖楼，还包括装修工程、家电销售等，是长链条产业。因此，千万不能把房地产污名化，这对经济发展是开倒车的行为。

自去年年中以来，房地产交易下跌近三分之一，企业资金都是负增长，且今年前两个月的交易量和去年同期相比腰斩，目前还没有探底。所以现在经济恢复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房地产没有恢复。

为什么房地产交易量自去年下半年后出现断崖式下跌？原因是房地产三条红线的出现——“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百分之七十”“净负债率不超过百分之百”“现金短债比不小于1”。这三条红线中，“净负债率不超过百分之百”还算合理，而其它两条几乎就是对房地产企业的致命打击。因为中国房地产模式和美国不同，不是现房交易，而是期房。“现金短债比不小于1”把房地产商的手脚捆得更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这段内容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指示一致，其中最后一句，“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



环和健康发展”最为重要。每一次要想让房地产发挥作用，都是靠“因城施策”，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目前很多城市已经开始为房地产松绑。

挑战和举措

1、主要挑战

挑战一：基建投资增长乏力

自2018年去杠杆开始，我们的基建投资增速越来越低，到2021年几乎没有增长。今年地方专项债为3.65万亿，而各地基建投资汇总超过30万亿。

去年中央也曾经给钱支持地方投资，地方政府也出台不少宏伟计划，但最后没有执行，因为基建投资早已显露疲态。为什么？我的观察是两点：

第一，地方政府开始关注投资项目本身的质量。被中央政府三番五次警告不能乱投资后，地方政府开始谨慎地对待投资，但现在好的基建项目也的确越来越少。

第二，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去杠杆。地方官员平均在一个城市任职三年左右，以前是借钱把形象工程做起来就走，债务留给下一任。但现在要求官员离任前接受审计，如果债务增加过多则不能走。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官员举债做形象工程的动力下降，风险上升。

挑战二：货币政策功效趋弱

央行去年放缓了货币发行速度。2021年央行资产增加6000多亿，2020年增加1.4万亿。今年明显加速了货币发行，一月份扩表7000多亿，二月份扩表3000亿。然而，货币政策放水并未达到预想效果，因为微观机制失灵，出现了“推绳子”效应（绳子拉东西能用上力，有拉动效果，推绳子则力量无法传导）。在整个市场缺乏需求的情况下，多数企业不愿意贷款，央行再发力也是推绳子。同理，我的店没有多少顾客，你还让

我贷款进货和发工资，这不符合商业逻辑，所以这样的政策不会有效果。

今年计划减税2.5万亿，力度非常大，因为全年政府收入才20万亿，相当于减掉12.5%。但对中小企业来说，在订单不增加时，减税只能减轻企业负担，不能促使其扩产。在经济增速远远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下，供给侧政策失效。本来供给就过剩，再促进供给就不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目前的瓶颈不在供给侧，而在需求侧。

今年大学毕业生超过千万，两会确定的新增就业目标为1100万，但今年也是退休高峰年，因为1962年是出生高峰年，大约出生2400万人。这批60后开始大面积退休后，会让出很多工作岗位，因此就业本身不是大问题。目前就业面临的困难来自于预期变差，源于需求不旺、企业开工不足，所以稳就业还得抓住需求这个牛鼻子。

挑战三：消费下降

这也是经济复苏面临的巨大挑战。消费增长降速的原因是房地产业收缩以及疫情导致的抗疫措施加强。消费本来在今年一二月份有所回暖，但三月疫情反复后又开始下跌。我们国发院的沈艳老师根据微信、支付宝的数据发现，线上和线下的销售额都在下降，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0%。

一国经济往往是一个闭环，生产-收入-支出（消费、投资、进出口）-生产，这其中需要生产等于收入，收入等于支出，支出等于生产。由于中国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不到2%，所以基本可忽略。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是，供给侧产能过剩，需求侧投资不振（受制于预期）、消费疲软。

但是我们总偏爱供给侧政策，这是计划经济后遗症。正常年景也没有大问题，但目前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下行压力太大，症状就会严重。我们不少人已经习惯于批评凯恩斯经济学，但在经济下行时，凯恩斯是对的，需要刺激消费、主动投资。

投资本来是我们的长项，但地方政府如今的投资意愿下降，企业也是，因为企业投资往往是顺周期。预期转弱就减少投资，于是经济最后进入死循环，转不动。也有人说，消费取决于收入，收入取决于生产劳动，所以现在经济转不动。但这只看到了内生性消费（基于收入的理性消费）。凯恩斯指出，除了内生性消费还有自主性消费，自主性消费则与本人收入无关。比如价格下降、政策更加便利、防疫政策宽松等，都可以促进自主性消费。因此，我认为从自主性消费入手启动经济的更高水平循环是可能的。

2、启动消费的具体措施

首要，要给老百姓发放现金。我们又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到疫情对穷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富人。

如果政府给穷人发钱，每人发 1000 元，最后成本也仅略高于地方专项债的三分之一；同时，钱的发放形式选择数字货币，既可以控制补贴的用途，避免老百姓将补贴转为储蓄，又能借此普及央行 APP 的使用。

其次，改进防疫措施。今后实施精准防疫是可能的，防疫措施应当不再封小区、封城，同时取消国内旅行限制，推广即时核酸检测，适度开放国际旅行。

就目前来看，今年要实现 5.5% 的增长目标恐怕难度极大。有很多预测说今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甚至达不到 5%，下半年的压力会更大。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重启国内消费，只有消费复苏才能让企业恢复信心，让经济转动起来。



数字化加速度——工作方式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¹⁷

陈春花¹⁸

北大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

我最近几年主要在研究数字技术对组织管理的影响。在和大家分享研究成果之前，我先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当下我们都在讨论数字化，包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个人的数字化生活、学习和交流等，但当我们真正要将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数字化时，又觉得会有很多的不适应。

我过去有很长时间都在研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但发现企业要真正转型成功并不容易。尽管企业的大部分市场和顾客价值已经开始数字化，但企业很难跟上去，企业还是更习惯于线下的工作方式和线下形成的绩效。调研发现，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然方向，企业是否拥有数字化的能力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分水岭。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在于，如何形成数字化的工作方式和能够支撑转型的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

鉴于此，我开始研究数字技术对组织管理的影响。

我先从顾客端发现了问题。数字技术下，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等各种创新为顾客带来了许多新的价值体验。作为管理学研究者，我关注的

是顾客新体验的背后支撑，作为提供这些新服务的企业管理有没有新的规律可循？

这是我提出“数字技术对组织管理影响”这个研究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两个研究主题缘起

数字技术对社会的最大影响是对人的改变。比如人际交往的方式变了，以前是写信、打电话，现在更多的是线上交流；人获取信息的来源变了，以前是看书、读报，现在是浏览线上的海量信息。企业管理的最主要对象是人，当人变了，组织管理的模式就得跟着变。

数字技术下，企业中与人相关的重要改变有四个——人所在的工作场景、人所在的组织形式、人所参与的业务和人传递信息的方式。因此，评价工作绩效的模式也变了。

在这一系列变化中，我们最终关注的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变化。我们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关注变化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商业模式和顾客价值体验发生变化，意味着企业的价值贡献方式变了。而前面提到的四

17. 本文根据陈春花于2022年3月26日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61期上的演讲整理。

18. 陈春花：北大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兼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山东六和集团总裁、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两次获评《财富》“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蝉联四届《财富》“中国最具影响力25位商界女性”。

个与人相关的重要改变，意味着企业管理中四个主要地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当我们回到“人在组织中”这个概念时，我们就需要探讨组织管理模式的改变。

我在北大国发院讲《组织管理》这门课，通过理论研究和企业调研发现，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经历了从“控制-命令式”到“服务-指导式”，再到“激活-赋能式”三个阶段的转换。

在“控制-命令式”的管理模式中，管理者具有权威性，而权威性让很多管理者感觉良好，因此今天也还有很多管理者愿意选择“控制-命令式”。

随着个人在组织中的价值贡献和顾客对企业组织的要求发生变化，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不得不由“控制-命令式”转换为“服务-指导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管理者的权威性被削弱，但成就感增强。通过提供服务和指导，管理者拥有了取得绩效和帮助员工成长的成就感，很多管理者都享受这样的成就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服务-指导式”的管理模式对管理者的挑战并不大。

当新生代员工出现，我称之为“个体价值崛起”，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发生变化，组织的管理模式又从“服务-指导式”转换为“激活-赋能式”。这种管理模式要求组织以成员为中心，这时管理者就必须是“无我”的状态，即管理者的权威性下降。当管理者把激活员工、赋能员工成长作为最主要的追求后，组织的活力和个体的创造力就会被释放出来，这也是当下那些领先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的特征。“激活-赋能式”的管理模式对管理者的挑战非常大，它要求管理者必须是“无我”的状态。

依据这样的背景，我选择了两个研究主题：数字化的工作方式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我的第一个研究主题是数字化的工作方式。在数字技术下，什么样的工作方式能够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而言是一项非常大的挑战，这意味着不确定性将成为组织发展中的常态。疫情反复，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到强烈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可预测且非常复杂。对企业来讲，如果要在这样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非常强的成长能力，那么如何驾驭不确定性就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问题。组织管理在过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绩效，而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在如何在实现绩效的同时驾驭不确定性。而组织能否驾驭不确定性，关键在于组织成员是否具有持续的创造力，因此，我们最终又回到了要去关注人的问题。

关注人的问题，在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关注机器人。在组织与外部的无限链接中，有很大一部分绩效来源于人工智能机器人。未来人机共生会越来越多的渗透到组织当中。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机器人技术已经应用在很多地方，比如无人餐厅、无人超市等。这意味着，组织管理在未来还会面临一项新挑战——与机器人一起工作。

我的第二个研究主题是如何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以激励企业获得可持续创新的价值。

今天我和大家要探讨的就是在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工作方式和人力资源管理到底面临着哪些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我们要理解和把握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自己要为此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数字化的工作方式

数字化时代，企业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我们合理利用数字化技术，以协同为核心，构建数字化的工作系统。疫情后，大家日渐习惯在线上课或者远程办公，这就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面对新的工作方式，我们需要探讨如何让它更加高效，以及人如何通过它变得更有价值。选择工作方式是为了有效支撑企业为顾客创造价值。因此，在探讨新的工作方式之前，我们先看看企



业在数字化时代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商业活动发生了什么变化。

顾客价值空间得以加速扩大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企业的发展基础是打造出了由数字技术提供的新的顾客价值。新的顾客价值的成长速度非常快，这就对我们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企业原来的顾客价值已经是一片“红海”，即供大于求。为了突破原有的顾客价值空间，企业尝试了新的产业组合，比如新零售业；又尝试了跨领域组合，比如知识付费、直播卖货等。如果按照传统的逻辑去走，顾客价值空间从供大于求扩展到新产业，再到跨领域需要经历很长时间。但是，数字技术加速了新的顾客价值空间的形成，其特点被称为“数字穿透”。利用数字穿透，企业加速进入到新的顾客价值空间，因此企业需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工作方式和组织能力，即新的商业模式。

当下许多新兴的数字企业成长得非常快，企业从几亿到几百亿的经营规模通常只需要很短时间。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加速获得了新的顾客价值。同时，创造顾客价值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主体只是这家企业，现在还可能有它的产业伙伴和业务伙伴。

企业从“前台”“后台”转向三大主体共创价值

为什么在数字技术下，顾客的价值空间可以变大？为什么数字技术能促使企业的成长空间和可运行空间变大？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分析法认为，企业通过基本活动来为顾客创造价值。这些基本活动包括，供应、生产、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等。企业要进行这些基本活动，就必须要有支持性的活动来辅助，包括人力资源、财务、行政、研发、采购等。波特认为，创造顾客价值的是基本活动，支持性的活动没有办法直接创造顾客价值。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在企业里被习惯称为“前台”和“后台”，通常前台直接为顾

客创造价值，而后台支撑和服务前台。

数字化企业的活动不再分为“前台”和“后台”，所有活动都参与创造顾客价值，而限于原来的基本活动。如今，整个业务体系都能直接给顾客创造价值；原来的支持性活动现在也成为运营活动的一部分，也可以为顾客创造价值。

此外，企业还可以与内部价值链之外的产业伙伴形成产业活动，一起为顾客创造价值。

如此一来，数字技术可以让企业依靠三部分的主体来创造顾客价值——业务体系、运营活动和产业活动。于是，企业所拥有的顾客价值空间加速扩大，这就是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最大的商业活动变化。

面对这样的变化，企业需要有新的工作方式去支撑它。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传统企业转型难，原因是企业还是只通过基本活动来创造顾客价值，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作方式支撑不了新的变化。有段时间企业流行讨论“组织中台”，但如果企业原有的工作方式不做改变，这些时髦的词对企业来讲就没办法产生任何意义。

总之，数字技术促使商业活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企业拥有的三个主体能共同创造出新的顾客价值，但需要数字工作系统和数字工作方式去支撑这种变化。

员工取得工作成效的方式不同以往

形成数字化的工作方式对企业而言也是一项挑战，意味着员工取得工作成效的方式要发生改变。

传统的工作方式主要产生于工业时代，强调员工取得工作成效的关键是完成岗位任务。企业为员工制定明确的岗位任务，员工完成了任务就是取得了工作成效。在传统的工作方式中，影响工作成效的核心因素是员工的能力和意愿，“有心有力”的员工就肯定可以取得工作成效。

但在数字化的工作方式中，判断员工能否取得工作成效的关键不再是能否完成岗位任务，而

是员工能否与工作中所有相关的人（包括客户和产业伙伴）保持互动与合作，能否与三个主体一起共同创造新的顾客价值。

换个角度说，员工要取得工作成效，除了完成岗位任务外，还包括通过与产业伙伴合作或者释放自身的效率和价值来创造新的顾客价值。因此，员工能否取得工作成效，取决于他能不能得到授权和赋能，能不能协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顾客价值。

对照来看，在工业化时代，工作成效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意愿，员工需要得到明确的岗位并且理解具体任务；进入数字化时代，工作成效取决于员工自身的创造力、与他人协同工作的能力以及直接创造顾客价值的能力。

总之，在数字化的工作方式中，影响工作成效的核心因素从原来的个人能力和意愿变成了以下三点：

- 1、对企业战略目标的理解以及动态调整自身行为的能力，即是否真正具有创造力；
- 2、与更多人合作的能力；
- 3、真正参与创造顾客价值的能力。

我们发现，那些在传统企业中能取得较好工作成效的员工，在数字化时代的转型中会更加困难。在传统的工作方式中，员工是去承担任务；在新的工作方式中，员工是价值的共创者，要主动去共同管理工作目标，要不断有新的成果产出，因此个人要做的改变会非常大。

我们同时发现，许多企业管理者的转型难点也在这里。传统的管理者特别在意企业给他提供了什么岗位、角色和资源。但在数字化的工作方式中，管理者需要关心个人能够拥有什么样的授权和赋能来创造新的顾客价值，以及能不能与更多的人合作。

关于新的工作方式这个主题，我是想告诉大家，如果商业活动的价值发生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就得随之改变。否则，我们会很难获得新的

顾客价值。

如何打造数字化的工作方式？

要改变工作方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做调整。

第一，更新认知。我们原有的认知是，为顾客创造价值是工作任务的一个分解。管理者的任务是规划岗位任务、按要求去招聘、培训员工能力、进行绩效考核、落实薪酬和福利以及保障良好的劳动关系等。企业跟员工之间就是分派工作任务的关系。

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的工作者和数字化的企业是在共同创造数字化的顾客价值，强调共同的价值目标。企业赋能员工参与价值创造，再根据员工创造的价值去评价和分配，企业和员工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劳动关系或是薪酬与福利的关系，而是价值共享关系。如何通过价值的连接和契约，让企业与员工创造价值并分享价值，这实际上需要我们更新自己的认知，了解数字工作系统。

第二，建立敏捷团队。数字工作系统需要建立起创造与获取数字化顾客价值的敏捷团队。换个角度说，数字化工作系统其实就是一支敏捷团队。打造敏捷团队需要打造三样东西——数字团队、数字领导力和数字个体。传统的组织管理讲的是打造团队、领导力和个体，但加上“数字”二字后就发生了变化。数字团队不再像原来一样，由管理者分配目标，而是转变为团队共同承诺目标；数字领导力也由原来的领导负责分工转变为员工主动的自我管理；数字个体要求员工个体所有的思考方法不再是以“分工”的概念为基础，而是要围绕创造顾客价值建立起“共生”的概念。数字工作系统，要求从数字团队、数字领导力和数字个体三方面来建立敏捷团队。

因此，当企业的商业活动发生变化，就需要与之匹配的新的工作方式。新的工作方式从认知的底层逻辑开始有变化，因为影响工作成效的来源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有的工作成效来源于固定



的角色、固定的任务和明确的岗位。数字化的工作方式要求员工与企业共创顾客价值，并且协同更多的人去创造顾客价值。

这些变化要求我们打造数字工作系统，将我们原有的工作方式进行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的工作方式是一个智能协同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打造数字工作战略、数字工作系统和数字工作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不需要关注自己有没有掌握数字技术，因为真正的挑战不是技术，现在可以提供数字技术的平台和工具都越来越多。真正的挑战是，能不能重建工作系统的运营机制。这套工作机制我们就称之为“数字化的工作方式”，其关键变量是数字个体，即我们每个人能不能真正拥有数字化的工作能力。数字个体强调的是，个体能否在数字化场景中，利用数字化技术，承担起数字化角色，然后用数字化的行为创造顾客价值。

数字个体的三要素

具体而言，数字个体要具备三要素：

- 一、具备数字化的价值场景；
- 二、个体承担的不是工作角色或者岗位角色而是价值角色；
- 三、个体的行为必须是一个价值行为。

以最典型的数字化场景“直播”为例。传统的零售活动是个体（店员）在店里与顾客面对面地达成交易。如果转变成数字个体，其最重要的是要构建起线上场景，个体在这个场景里不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去促成交易，而是去寻求顾客所要的价值，再不断地引领传播价值，并与顾客产生价值互动，最后通过价值分享来提升顾客的感受。

可以看到，当线下店转换为数字化场景后，整个活动就变了。传统活动是将战略目标一点点分解下来，最后落实为个人的任务和资源。而数字化的价值活动，是围绕顾客价值做一个资源重新配置。传统的活动以任务和目标为导向，数字

化的价值活动以顾客价值为导向，二者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

同时，个体创造价值的方式也变了。传统活动中，个体只是价值创造的一环，而在数字化场景中，个体参与价值创造的所有环节，这时个体为顾客创造价值就会变得更加迅速、便捷。

数字化工作方式的优秀案例

海尔公司的“人单合一”，让产业活动的所有参与者从原来的竞争关系变成共生关系，整个商业活动从原来的交易过程变为交互过程，将订单和人组合在一起。海尔的“人单合一”被认为是制造企业真正的数字化平台模式，用数字个体、数字工作方式有效地支撑起业务活动。

这样的企业还有安踏公司。作为一家零售企业，安踏较早地确定了做价值零售的发展战略，于是它形成了数字工作系统，建立了适应整个商业活动的数字化工作场景，完成了从单纯的“价值转移交互”转换为复杂的“价值活动交互”，整个工作重心也从“交易达成”转换为“创造和交付价值”。

金蝶公司是我们主要的研究合作伙伴。它不断创建智能协同的数字工作方式，是数字化转型非常成功的软件企业，其转型的速度在同业中脱颖而出。智能协同的数字工作方式让个人效率和协同工作的效率从低效能的手工模式转向高效的数字化模式，为软件行业的转型探出了一条新路。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让人更具成效、更有价值，我们的工作方式必须朝着数字化转型。

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今天我们讨论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模式，原因就在于，数字个体的工作方式需要调整，那么我们对个体的评价、培养、赋能都需要调整。

人力资源管理最早被称为“人事管理”，是把人作为“经济人”假设，主要任务是让劳工稳定，

提升个体效率，并通过管档案、福利来管理人，典型的企业组织结构是人事部和行政部。

随着人对自身认知的提升，“人力资源管理”开始出现，这时把人看成是“社会人”而不只是机器或者经济工具，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用人力资源的专业化知识和技术去挖掘和激发员工的潜能。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核心点是，人是最重要的资产。如何去激活这一资产，这其实是有瓶颈的。

今天，人力资源管理把人看成“更进一步贴近人性本身、复杂的、需要自我实现”的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怎么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手段让个体与企业的战略目标达成共识，让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我，企业与人之间怎样寻找共同成长的成长空间。

当我们进入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阶段，人力资源已经发生了如下三个根本性变化，因此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复杂。

人力资源的三大变化

第一，人才生态的变化。当下的新生代员工是“数字原住民”，拥有非常丰富的数字体验。另外，当下的企业组织绩效中有很大大一部分绩效是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完成的，特别是一些可衡量、可程序化、可量化的工作都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人力。

第二，员工自我价值定位的变化。在新的组织秩序下，年轻人的工作目的不再是单纯为了赚钱，他们对工作的意义和使命感有更高的要求。

第三，组织活动核心的变换。随着数字化技术下商业活动的改变，员工与组织、客户的关系以及组织与外部的关系都被重塑。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者的核心能力是可以赋能个体、团队、企业和外部组织，通过激活各个主体，让他们协同创造价值。

为研究这部分内容，我的研究团队与金蝶公司共同发起了“数字化时代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系列调研。我们发现，人力资源的数字化转型有五项内容：

一、人力资源管理本身的数据化、科学化；

二、新生代员工的多元价值观和职业期望；

三、团队和部门之间的协同与共享；

四、雇佣关系的多元化；

五、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以及自动化程序等管理问题。

此外，协同成为组织效率的新来源，而企业的效率困境多源于组织之间的协同困境。调查发现，处于协同困境的企业中，有72%—73%的企业在计划转型，并且有24%的企业已经开始行动。

真正“以人为中心”

今天的企业员工存在多元的雇佣方式，包括兼职员工、临时工、劳务派遣员工等。员工的需求也更加多元，除了以往的福利和薪资需求外，还有弹性工作时间、移动办公、健身设施、雇员援助计划等新的需求，这也表现出员工自主性的变化。

同样有意思的发现还有：在当下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能力的要求中，排名靠前的是技术能力、社交能力、认知能力和感知能力，这与以往的要求有明显不同。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在工作决策中为员工赋能、重塑组织的要求、参与企业战略制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较以往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些改变意味着，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从“以企业为中心”转到“以人为中心”。以前讲人力资源管理也说是“以人为中心”，但实际上还是以组织目标为中心。而当真正以人为中心时，我们就要考虑怎样去创新人力资源管理，以使人力资源为企业创造价值真正发挥作用。

相应地，人力资源管理原本在组织中担任的最重要的四个角色被重塑了。尤里奇曾提出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中有四个最重要的角色，分别为：



战略的合作伙伴、效率的专家、员工的支持者和变革的推动者。

企业数字化转型后，这四个角色的基本职责发生了很大的调整。我们在研究中做了一个新模型，因为企业已经变成多主体，包括：个体、组织、顾客、产业伙伴和共生伙伴。人力资源要确保这多个主体能共同去为企业创造价值，我们称之为“共生价值”。多主体创造价值时，就更需要人力资源管理具备战略导向，能够真正为多主体赋能，建立起契约链接机制，让多主体拥有合作的基础，同时以价值创造为标准来做评价和分配。

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优秀案例

目前，一些领先企业在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方面做得非常好。

华为拥有非常强大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一直打造“协同组织战略”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华为的第一阶段发展战略是“活下去”，当时的重点是人事管理和有效招聘，即找到奋斗者，然后活下去。第二阶段，华为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增长与全球化，这时的人力资源管理就开始打造非常多的工作系统来支撑这个目标，包括职位薪酬系统、股权系统、IPD 流程、集成供应商系统等，实现流程化的组织建设。第三阶段，华为把战略目标定位为引领全球。这时它搭建起“三支柱”的全球化人力资源体系。“三支柱”指建立共享中心、对战略的服务能力和帮助员工的专业能力。第四阶段，华为的战略目标是引领和超越自我，这时它的人力资源是要有能力去服务业务伙伴，让自己成为人力资源专家中心，搭建起人力资源的共享服务中心。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完成了对企业战略的高效协同与匹配。

腾讯的市值位居全球领先之列，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不断通过跨边界的契约设计让人才的获取、保留和共享成为可能。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为了帮助员工理

解个体价值贡献与顾客价值贡献之间的关系，远大公司制定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人人账本”。这项制度把个人创造的价值和获得的成长记入一个“账本”，让人一目了然个体在整个价值活动中创造的价值和能够分享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实践。

人力资源新模式的关键是激发员工的价值创造力

上述领先企业的实践告诉我们，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一些新模式来帮助人力资源和数字个体回到商业活动的价值创造中，并形成有价值的闭环。

现在有个时髦的词是 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是一套明确跟踪目标及其完成情况的管理工具和方法）。OKR 和 KPI 的区别是什么？KPI 是指目标和任务是明确的，环境是相对稳定的，然后用 KPI 来对员工进行考核。但是今天，数字技术及环境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企业不得不转用新的考核方式 OKR（目标与关键结果），重点关注个人怎么样去实现目标，怎么样去衡量关键结果，以此让组织更加聚焦，能够时刻响应外部的变化。所以 OKR 最大的优势是能够与外部互动，让员工集中精力在共同目标中做出非常明确的贡献。

在研究中，我们还设计了 ORKE（目标与关键结果及赋能法）来帮助企业绩效考核，以实现 OKR。ORKE 是指企业核心层能够赋能个体和团队目标与关键结果，它更加关注个体的需求成长和团队目标之间的融合，关注搭建个体与组织共有的价值体系，找到目标的实现路径和结构体系，再用数字技术的框架去支撑它，同时针对外部环境进行调整，最终实现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

ORKE 比 OKR 多了一个赋能实现的路径，该路径中包括利用生态和共享平台、组织中台等。比如企业拥有生态业务伙伴、指导委员会或者整合服务中心，就可以从各种角度来为大家赋能，最后实现 OKR。这些研究都是为了回到人力资

源管理的本质——人和组织怎么样去做价值经营，最终释放人力资源本身的价值。

综上所述，数字化加速发展后，我们原有的工作方式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都将面临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终结。因此，特别

欢迎大家来到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学习，因为新技术、新改变要求个人更新知识系统，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探讨不断发展的新管理议题。

最后我用自己常讲的一句话来做总结：学习者掌握未来。



从战争学管理 ——如何突破不确定性局面，变被动为主动¹⁹

宫玉振²⁰

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BiMBA 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今天活动的直接缘起是我的新书《铁马秋风集》出版。同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也是国发院 EMBA 课程的一部分。

2004 年，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时任院长胡大源教授主持开发了现地战略体验课程，把商学院的课堂搬到当年的战场，带领学生到实地体验战争中管理的智慧，从军事看管理，从战争看竞争。我有幸与胡老师一起从事开发现地课程的工作，至今已有十八年，四渡赤水是 BiMBA 商学院一系列军事战例现地教学课程之一。

今天分享的话题基于四渡赤水课程的一部分，主题是：从战争学管理——如何突破不确定性环境的局面，变被动为主动。

不确定性对管理者的影响

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国际格局的动荡，加上政策的调整、技术的演进、市场的竞争、疫情的冲击等因素迭加在一起，导致外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

不确定对管理者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大致有以下三个：

第一，使人焦虑迷茫。人的本性追求确定、追求秩序，希望事事可预期，但环境的不确定性

恰恰打破了这种需求，因此，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会出现焦虑、迷茫，甚至情绪化。

第二，使人急功近利。不确定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未来的不确定，因此很多人就不愿意对未来进行投入，往往只关注现实和眼前，甚至会表现出机会主义，导致急功近利和短视。

第三，使人随波逐流。既然环境是不确定的，我做什么都无法改变，就随波逐流好了。这种无力感会使人陷入消极与被动，放弃主动把握和改变命运的努力，听凭环境的裹挟。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今天所处的环境，其本质就是不确定的，想回到过去那个相对确定的环境已经不可能。

战争环境的特点：不确定性

从战略的角度来说，不确定性带来的一个影响是：过去我们讲战略，往往制定了战略就可以管 5 年、10 年。现在不行，外部环境高度易变、不确定、模糊、复杂。

打个比方，过去定战略像登山。山就在那里，是静止的，大致方向你是知道的。你要做的只是规划一条路线，然后率领你的团队，依靠你的经验、体力、协作精神等因素走下去。途中可能会走一

19. 本文根据宫玉振在2022年3月10日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20. 宫玉振：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些弯路，但是山本身是不变的。

现在从爬山变成了冲浪。浪是一波接一波的，动荡、不确定，战略的地基是动荡的，这对每个人都是最大的挑战，管理者会陷入迷茫或不适。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从军事看管理，从战争看竞争？尤其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为什么我们用战争的案例来思考企业的战略？

因为，战争的本质就是不确定的。自古以来军人就必须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中外的军事家早就揭示了这个主题。

2500年前，中国的孙子就提出了“兵形象水”的命题：“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和水一样，水永远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战争也永远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无常”，就是动态，就是不确定。

19世纪《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明确提出了不确定性的概念：“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

今天大家常谈的VUCA这个概念（VUCA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分别代表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就是上世纪80年代美军在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VUCA后来被引入商业领域，被公认为是商业环境最本质的特征。

不确定性带来了战争的最大悖论：战争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是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没有人从一开始就能看到结果，没有人对大势的理解能够一步到位，更没有人能一次性看清所有过程和细节。因此也就造成了战争决策的最大悖论：

一方面，在战争史上，完全按照计划来实现的战略只能是例外，而不可能是常态。普法战争的指挥者、普鲁士名将老毛奇曾讲：“在遭遇敌人的时候，没有任何计划能够保持一成不变。”

另一方面，战争又必须有计划，没有计划或者计划漫不经心从来都是战略的大忌。战略的价值就是要解决这个悖论的。为什么在战争中一定

要有战略？战略就是驾驭不确定性和利用不确定性的艺术。战争中的战略就是用来应对和利用不确定性的。

从四渡赤水看战略的相机决策

战争指导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不确定的历史。所以借助战争的案例与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究竟什么才是不确定性环境中的战略？如何制定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不确定环境下战略决策的基本逻辑到底是什么？如何通过战略来突破不确定性的困境，变被动为主动。

先简单介绍四渡赤水的过程。

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是蒋介石此时开始调兵遣将，在遵义地区形成了合围态势。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决定，放弃原定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准备北渡长江到四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重建根据地。

一渡赤水

具体的方案，第一步推进到土城、赤水一带地区，在赤水县城渡过赤水河。然后寻机在泸州市上游渡过长江，那一带适合大部队渡江。万一渡江不成，就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寻机由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长江在宜宾上游就叫金沙江。

既有方案A，也有方案B。

1935年1月19日，红军兵分三路向土城和赤水一带推进。但四川军阀派出12个旅的兵力，除4个旅分别防守宜宾、泸州之外，其余的8个旅兵分三路，对红军分进合击。中路的川军进展很快，林彪两个师分别在黄陂洞和复兴场作战失利，打开赤水县城、打开北上通道的计划就没有实现。而这个时候，东路的川军也已经尾随而来。

毛泽东得到林彪失败的消息后向中央提议：干脆在土城集中三、五军团两支主力，利用土城地形之利设伏打掉尾随而来的川军，然后配合一



军团全力北上，继续完成原定计划。

土城之战由此打响，但没有想到川军越打越多，不但没有消灭川军，我军阵地反而被川军突破，不得已紧急调回林彪的红二师，才暂时稳住了阵脚。这时候才发现是情报失误。

土城失败，中央意识到原定由泸州上游渡长江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放弃土城战役，西渡赤水河，一方面摆脱川军的压力，另一方面寻机执行第二方案，即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

这个方案也无法实施。红军西渡赤水后，川军的主力又压了过来，红一、三军团先后作战失利。中央意识到川军已经加强了整个长江的防御，第二方案也已经不可能实现，于是下令迅速转向云贵交界的扎西集结，以便摆脱川军。

二渡赤水

红军到扎西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扎西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利用国民党判断红军还要北渡长江，干脆出其不意，杀个回马枪，杀回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遵义一带地区，避实就虚，通过进攻来把主动权夺回来。

1935年2月11日，红军兵分两路挥师东进，2月18日到21日分别在太平渡和二郎滩二渡赤水，先后攻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到遵义，蒋介石判断红军要东渡乌江到达湘西，所以又开始调兵遣将，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根据这种情况，中央做出决定利用九军团伪装主力，把北边的国民党部队往东引，同时集中优势兵力秘密向遵义以西运动，在此设伏打掉正在向东运动的国民党周浑元部队。

周浑元通过飞机侦查发现了我军动向，缩了回去，打掉周浑元的计划就落空了。3月13日，中央决定主动向鲁班场发起进攻，消灭周浑元的部队，这就是鲁班场之战。

三渡、四渡赤水

3月15日鲁班场之战打响，但一直打到黄昏时分，也没有进展，这时东边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在向西攻击前进，再打下去对红军不利。毛泽东果断提议放弃鲁班场。

鲁班场之战没有达成作战目标，但这一仗取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吸引了国民党主力西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顺势而为，在茅台三渡赤水河，把国民党部队进一步引入川南地区，然后红军出其不意四渡赤水河，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于是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吸引国民党主力西移之后，3月21到22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随即掉头南下，3月31日突破乌江，从而把国民党几十万追军甩在乌江以北地区。

红军突破乌江，兵临贵阳，而蒋介石正好在贵阳。蒋介石要求各路国民党大军迅速到贵阳“保驾”。但红军虚晃一枪，向东而去。等到各路国民党大军东调，红军出其不意又杀了个回马枪，在龙里和贵阳之间突破了国民党的防线，然后以一天120里的速度沿着今天的惠水、长顺、紫云一线，进入云南，并直逼昆明。

昆明是一座空城，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非常紧张，赶紧下令尾随红军的部队抄小路赶回昆明，同时又要求各地民团先向昆明集结。这样一来，金沙江上的国民党防线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为红军渡江提供了机会。

中央立即抓住机会，下达了抢渡金沙江的命令。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云贵川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

战争的启示：没有一劳永逸的完美战略

我们今天讲四渡赤水，是因为四渡赤水是一个经典的在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下通过灵活机动的

战略决策、变被动为主动的案例。

四渡赤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四渡赤水并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一渡的时候没有想到二渡，二渡的时候没有想到三渡，但是三渡的时候想到了四渡。

四渡赤水是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决策的过程，是在机动中不断寻找和把握新机会的过程。

红军长征也是如此，也是一个不断改变计划的过程。

长征起初并不是要到陕北去，而是计划到湘西与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建根据地。但是湘江一战暴露出我们的意图，所以毛泽东在黎平会议明确提出不能再去湘西，要转兵西进，占领遵义，以遵义为核心建立根据地。这就有了突破乌江。

到遵义之后，发现这里不适合建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于是向中央提出：放弃遵义，北渡长江，到四川会合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重建根据地。这才有了四渡赤水，才有了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然后是爬雪山，到了川西北。

红军到川西北之后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根据地。川西北就是今天的阿坝，高原、藏区，根本养活不了这十万人。此时，中央和张国焘围绕下一步是南下还是北上产生了分歧。

毛泽东他们被迫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但依然不知道具体要去哪里。一直到甘肃的哈达铺，在国民党的邮局的报纸上，看到了陕北有刘志丹红军的报道，这才下决心到陕北去。

长征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到陕北去，长征也是一个不断改变计划、调整方案的过程。

这就是真实的不确定环境下战略决策的案例。环境是不确定的，人的理性又是有限的，战略不可能是事先完全设计出来的，而是在行动的过程中一步步探索出来的。战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试错、开放、学习、探索的过程。

这对我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制定战略，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好的战略计划必须具备两方面的要素。

一方面，一定要提供清晰的战略意图作为行动的基本框架。就像四渡赤水的战略意图，是要北渡长江。有了这样的战略意图，就可以为组织的行动提供一个大致范围和总体的方向。

另一方面，在行动方案中，还要给种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留出足够的空间。你必须适应环境，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必须随时准备迎接意外。就像四渡赤水，如何达成北渡长江，要因敌、因地、因时而动。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你的战略和计划不可能是事先一次性的决策。不要奢望一次性就可以制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然后完美地执行到底。

你一开始所能明确的，最多是总体的战略意图和大致战略方向。你能提出的，最多是基本的战略假设和初步的行动计划。你的总体战略意图要保持不变，但最初的行动计划，在真正执行的过程中，大概率是需要修正的，甚至可能全部放弃。

从认知的角度讲，战略明晰的过程又注定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探索的过程。这就要求战略计划必须保持弹性、柔性、灵活性。更主要的是，要对未知的机会保持开放性。

就像四渡赤水这样的作战，有时候一丝一毫的威胁就可以让你全军覆没，有时候一丝一毫的机会就可以让你突围而出。你要做的就是打开心智，打开每个毛孔去感受环境的变化，在混乱之中去寻找机会，在动态之中去创造机会。

更主要的是，这种打法还可以让对手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战争永远是不确定的，这对战争双方来说都是如此。所以，关键是谁能够尽量减少自己的不确定性，同时增加对手的不确定性。



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双方拼的就是实力、资源、消耗，那么弱者就永远没有机会打败强大的对手；但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弱者反而有可能通过机动灵活的行动，虚虚实实的策略，引导对手去犯错误，让对手陷入混乱，甚至让对手的体系陷入崩溃，最后取得胜利。

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机会就是通过不断运动使得国民党手忙脚乱，整个体系出现崩溃。

真正的高手并不排斥不确定性，相反，他会拥抱和驾驭不确定，把战略和决策变成利用不确定性来创造机会的过程，变成打败对手或者拉开与对手距离的最好机会。四渡赤水中，不确定性变成了红军最好的朋友。

这是我们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必须有的一个基本心态。

战略的层次

当然大家可能会问：既然四渡赤水不断调整计划，那制定战略还有什么意义呢？还要战略干什么呢？

其实，虽然四渡赤水不断地在调整，但有一条没有变，就是要北渡长江到四川去；虽然长征也是一个不断调整方案的过程，但是有一条没有变，就是寻找新的根据地。

所有战术层面的变化，其实都是围绕着更好地实现相对稳定的战略意图而展开的。这样一来，一方面，战术的不断变化就有了不变的轴线；另一方面，只有在战术层面根据环境不断地调整，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更好地实现组织的战略意图。

当然，战略意图也只是相对稳定的，是阶段性的，从长远来说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红军到了陕北以后，西安事变发生，中央的战略意图就转变成了国共合作抗日。

在阶段性战略意图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

不变因素，就是组织的使命与愿景。这就是“变”之中“不变”的因素。

红军四渡赤水，先后变了十多次作战方向，战士们跑得非常辛苦，而且不断改变计划，刚刚要求向左，突然又要求向右，下属也会质疑、郁闷、沮丧。尽管如此，一旦中央做了决定，战士们执行起来从来不打折扣。为什么？因为这个组织的使命和愿景从来没有动摇过，每个人都真心相信共产党的政治目标与追求一定会最终实现。

环境是不确定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是当一切都不确定时，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对未来强大的信念，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坚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

四渡赤水中，国民党的装备和补给比红军的好很多，但为什么红军在极其艰苦、极其疲劳的情况下依然以惊人的意志完成了作战任务，而国民党却怨声载道、士气低落、意志消沉？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双方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的不同。

让我们概括一下，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有三个层次：根本性的组织使命、阶段性的战略意图、眼前的行动选择。组织的使命是不变的、不能动摇的，战略意图是相对稳定但会阶段性调整的，而当下的行动则要随机应变。

变之中有不变，不变之中有变，构成了一个完美的体系。我们所有的决策因此就有了根基。

组织的信念和使命越坚定、越清晰越好，但是实现组织战略目标的手段和路线越灵活、越敏捷越好。

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因为只要相信前途的光明，就可以承受眼前道路的曲折；必须走过曲折的道路，才能达到前途的光明。

从战争中总结出的这些理论，其实与中国传统《易经》的核心含义完全契合。易有三义：变易、简易、不易。

“易”的第一层含义是变易，对应的是战术

行动要不断随机应变；

第二层含义是简易，对应的是战略意图要以简驭繁，提炼出最核心最清晰的东西，大道至简；

第三层最核心的含义是不易（不变），对应的是使命、愿景、价值观不能动摇。

古老的《易经》已经包含了应对今天不确定环境的基本智慧。智者乐水，中国人骨子里对于变动的环境其实是有亲切感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思维体系里天然包含了水一样的智慧内涵。

结束语：如何变被动为主动

在不确定的战略环境中，最大的战略能力就是感知、驾驭和利用不确定性的能力，甚至包括

给对手制造更大的不确定性的能力。

这就要求我们把不确定性作为常态，并主动地去塑造未来和创造未来。

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红军3万人，国民党40万大军，从常规来说红军没有取胜的机会。红军为什么可以突围而去？红军始终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智慧和行动来影响和塑造自己的未来。

在不确定的环境下，积极主动地创造未来，永远比预测未来更为重要。我们要学会与不确定性共舞，并把战略变成利用不确定性来创造机会的过程，让不确定性成为我们的朋友。

这样，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成为不确定环境下最大的受益者。



一、2022年4月20日至22日，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应邀参加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林毅夫教授22日参加“中欧企业家对话”闭门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并与汉堡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欧洲政策中心CEO汉宁·万贝尔（Henning Vöpel），德国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中德金融经济中心主任教授霍斯特·勒谢尔（Horst Löchel）在线交流。黄益平教授分别主持21日晚“数字经济：让所有人获益”分论坛，以及22日上午“金融支持包容性”圆桌论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北大国发院联合创始人、经济学教授易纲同期受邀参加年会，并于22日下午在“全球通胀、加息潮与经济稳定”分论坛上，以“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妥应对外部环境冲击”为主题发表演讲。

二、2022年4月21日，北大国发院发布校友基金课题立项公告：在国发院校友基金支持下，经课题评审委员会匿名评审，学院师生申请的8项研究课题正式得到资助立项。这是2022年度国发院校友基金资助学院的第一批研究课题，也是广大校友们以切实行动来支持学院师生持续开展接地气的、针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学术研究。

三、2022年4月22日，袁国术校友向国发院校友基金捐赠暨“杨壮跨文化领导力教室”揭幕仪式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249教室举行。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姚洋，国发院管理学教授杨壮，国发院校友基金理事长霍斌，国发院EMBA校友袁国术，以及持续支持跨文化领导力交流活动的多位老师、校友等共同出席仪式。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BiMBA

商学院常务副院长范保群主持仪式。为支持北大国发院发展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各项工作的开展，感恩以杨壮教授为代表的北大国发院师生、校友对个人及企业成长的指导和支持，北大国发院EMBA2008级校友袁国术向国发院校友基金进行大额捐赠。为纪念这一爱心捐赠，承泽园249教室被冠名为“杨壮跨文化领导力教室”。

四、2022年4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条法司发来感谢信，对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汪浩为财政部2022年度相关工作所做的突出贡献表示诚挚感谢。汪浩教授在财政部条法司开展2022年“完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制度保障和政策举措”调研工作中，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等诸多难题，对工作高度负责，严谨专业、认真细致，系统分析了我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借鉴了国外相关经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还通过座谈讨论和详实的书面材料，提出大量宝贵意见和建议。财政部条法司为此特别感谢。

五、2022年4月23日，北大国发院第四届国家发展青年论坛成功举办。论坛由共青团国家发展研究院委员会指导，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生会、学生会主办，CCER Club协办，国家发展研究院校友基金资助。本届论坛自启动以来，共收到作品669份，最终共151名代表受邀出席论坛。除了研究结果的分享、点评与探讨，论坛还评出“国家发展观察奖”一、二、三等奖。论坛开幕式线上同步直播，近两万人观看。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致欢迎辞。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发表主旨演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当代中国青年：使命与机遇”。国发院党委书记余淼杰教授代表学院在闭幕式致辞。

版 权

主 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 办: 北大国发院智库 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主 编: 黄卓
执行主编: 王贤青
执行副主编: 白尧
编 辑 部 (按姓氏拼音)
曹毅、高玲娜、刘海波、王勋、王志勤、朱丽

电子订阅方式

扫描本二维码，填写联系信息



合作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75 9033
邮箱: ybai@nsd.pku.edu.cn

官方网站

www.nsd.pku.edu.cn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北大国发院智库